授予单位代码 10459
学号或申请号 020284
密 级

郑 州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论文题目： 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研究

作者姓名： 胡 洪 琼

学科门类： 历 史 学

专业名称： 考古学及博物馆学

导师姓名、职称： 张国硕 教授

二零零五年五月

内容摘要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殷墟科学发掘墓葬中的陶器组合为第一手资料，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纵即是以时间早晚为基础，考察不同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早晚变化；横则是指同一时期不同区域间墓葬陶器组合的变化，主要考察当时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关系等问题。

本文对解放以来殷墟已公布的 1900 多座墓葬中的陶器组合进行了初步统计。在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的基础上，将殷墟墓葬也分为四期，即殷墟墓葬第一、二、三和四期。对各期墓葬中出土的陶器分别进行了归纳和分析，将不同用途的陶器作了分类组合。

依据陶器的不同用途，将各陶器组合分为七种类型：即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和炊食器配套类；炊食器和盛贮器配套类；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配套类；盛贮器类；仿铜陶器类。对各类型的陶器组合，分别从不同时期不同区域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晚商时期，酒器类数量大增，尤其是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占有相当的比例。

早中商、殷墟和西周三个时期墓葬中陶器组合有着区别和联系。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是在吸收二里岗期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对西周初年陶器组合有深远的影响。

殷墟时期，虽然墓葬中随葬的食器有所增加，但酒器在各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较多，陶器组合仍然是“重酒的组合”而非“重食的组合”。酒器的盛行，反映了晚商时期殷人嗜酒的风习。

关键词：殷墟；墓葬；陶器组合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forefathers' research, the dissertation carried on comparatively study with the firsthand materials the collection of ware in the grave that excavated scientifically, from the longitudinal and latitudinal aspects. Longitude analysed the change of ware collection in graves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n the basis of the time. Latitude referred to the change of the collection of ware in graves in the same periods and different areas in order to know about the social customs and relations of the time and so on.

The article had a preliminary conclude on the ware collection of more than 1900 graves already published in Yin Ruins after lib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four periods of culture of Yin Ruin , we have divided graves into four periods, namely, the First ,the Second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period of Yin Ruins' graves .At the same time ,the author concluded and analysed the wares in different graves .Finally the author classified the different purposed wares .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uses of ware, the author divided the collection of ware into seven types .wine utensil; cooking , eating utensil; wine utensil and cooking , eating utensil combination; stored utensil ; cooking, eating utensil and stored utensil combination; wine utensil and cooking , eating utensil and stored utensil combination; Fang Tong ware .

Referring the collection of all kinds of wares, the author researched respectively from the different periods and area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he number of wine utensil has increased ,especially ,wine utensil and cooking, eating utensil combination has occupied a large proportion in Late Shang Dynasty.

The collection of wares among Early and Middle Shang, Yin Ruins and West Zhou Dynasty had the difference and relation .The ware collection in Yin Ruins developed from the Er Li Gang Period .In addition ,it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early West Zhou Dynasty .

In Yin Ruins period, although the eating utensil is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wine utensil has a great deal of proportion, the collection of ware is yet the wine utensil collection and isn't the eating utensil collection . To prevail wine utensil, it reflects that people is addicted to wine in Late Shang Period.

Key words: Yin Ruins; graves ; the collection of ware.

郑 重 声 明

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撰写并完成的，学位论文没有剽窃、抄袭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侵权行为，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特此郑重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胡洪瑔

2005 年 05 月 15 日

前言

殷墟位于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作为晚商时期的都城，共历时二百余年[1]，当时约有人口23万人[2]。自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了大量的文化遗迹和遗物，这些为殷商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墓葬是殷墟文化遗迹重要的组成部分。迄今，殷墟已发掘万余座商代墓葬，主要分布于以小屯宫殿宗庙区为中心的四周，包括今大司空村、后冈、苗圃北地、四盘磨、梅园庄、孝民屯、郭家庄、殷墟西区和南区等地（见图一）。如此众多的墓葬，为研究当时的社会风俗习惯、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资料。

作为史前时期人类制造的最为重要的产品，陶器和人类日常生活的关系最为密切。由于陶器易于变化，特征明显，数量众多，因而成为考古学文化分期的重要依据。到了夏商时代，陶器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考古发掘表明，殷墟墓葬中陶器是最为常见的随葬品。其出土数量多，种类齐全，很自然成为学界研究殷墟文化的重要依凭。分析殷墟文化研究史可以发现，不同陶器的特征、制法、质料、颜色、纹饰、功能等，学者们多有较深入的研究，而关于墓葬陶器组合方面的专题研究，学术界则较少涉及。

所谓墓葬陶器“组合”就是指不同用途、不同种类的器物经常一起共出于一座墓葬中，形成一种较固定的配置形式。不同时期同一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不同，即便是同一时期不同墓区，墓葬的陶器组合也有所区别。通过研究殷墟墓葬中随葬品的多寡及组合特征，可以了解墓葬制度，从而了解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社会财产关系、等级关系、血缘、亲属关系等等。

对殷墟陶器组合的研究，必须建立在殷墟文化分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殷墟文化分期是50年代提出的研究课题。195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及苗圃北地的资料，将殷墟文化分为两期，即大司空村第一期和大司空村第二期，并对两期的年代进行了初步推断[3]。1962年秋，在大司空村遗址的又一次发掘中，根据新发现的文化层堆积资料，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

[1]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2] 宋镇豪：《夏商人口初探》，《历史研究》1991年4期，105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6页。

细分为四期，即大司空村一至四期[1]。

邹衡先生根据30年代和50年代的考古发掘资料，对殷墟文化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期研究[2]，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对各期的年代进行了分析推断。郑振香先生对殷墟文化分期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将殷墟文化分为四期，对第一、二期又细分为偏早和偏晚两个阶段[2]，但仍沿用第一至四期的划分法。本文采用这一四期分法。

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根据殷墟遗址和墓葬中出土陶器的形制和特征将殷墟墓葬也分为四期（见图三），并对四期的陶器组合作了简单分析。多数学者主要是就某一区域的墓葬陶器组合进行简单分析，或只是在相关论著中顺便提及，缺乏针对性的综合研究。本文根据已公布的墓葬发掘资料，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就殷墟墓葬陶器组合的种类与分期，陶器组合的时代特征和家族特征，陶器组合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生活，陶器组合的形成及其渊源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一、殷墟墓葬出土的陶器种类

（一）殷墟墓葬中陶器出土情况及其种类

1. 陶器出土情况

殷墟地区的墓葬，绝大多数都有随葬品。大、中型墓葬随葬品以铜器为主，辅之以陶器和其它种类器物；而小型墓随葬品则多以陶器为主，有的兼随葬少量的青铜器。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有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骨器、蚌器等。根据以往的发掘报告可知，墓葬中随葬品的放置位置即出土情况有所不同。陶器多放置在二层台内或二层台上，而较贵重的器物如铜器、玉器等则放置在棺内。设置有壁龛的墓，则将陶器放置在壁龛内。没有二层台的墓，有时也将陶器放置在棺内。玉器多半含在墓主人口内或佩在身上。贝放在墓主人口内、手内、脚下三部分，有时分放两处，也有的分放三处。这是常见随葬品的一般放置方法。

从众多有关殷墟墓葬的发掘报告中，笔者发现，墓葬中陶器的出土情况主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8期，382页。
[2]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64年4期，58页。
[3]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年，116页。

要有以下几种：棺内，这常常是随葬器物较少的墓；椁内棺外，多为有棺椁的墓；二层台，有放在头前二层台上，也有的分放在左右两侧二层台上或足端二层台上；椁顶，也有的放在椁室内；壁龛内，通常是一些墓室小而且有壁龛的墓；棺盖上或棺两侧；填土中，1953 年安阳大司空村墓中出土的陶器，有一部分出自墓葬填土中[1]。无二层台的墓，陶器绝大多数放在墓主人头端（或在头正中、或偏左、或偏右），少数的放在颈部，亦有放在小腿骨旁侧或足端的，但极少见。

2. 陶器种类

陶器从实用的角度分实用器（即日常用陶器）、明器、仿铜陶器三大类。此外，还有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等陶瓷器。陶器按陶色分为灰陶、黑陶和红陶三种。按质料分为泥质、砂质、夹砂和瓷土四大类。陶器的质料，考古学者们又称为“陶系”，即指陶胎的泥料。商代陶器中泥质陶占大宗，按其功能或用途不同大体可分为酒器、炊食器、盛贮器等。酒器有觚、爵、斝、觯、罍、卣、尊等，炊食器有鬲、甗、甑、豆、盘、簋、盂、罐等；盛贮器有壶、瓿、盆、瓮、鼎、小壶等。有些器物可能既是食器又是酒器或其它类器物，另有些器物可能一器多用。目前，学术界对陶器用途的区分标准不是十分严格，有不同的分法，如有学者将壶、瓿等器归入酒器类，而本文将此归入盛贮器类。

学术界对鼎的用途也有不同的说法。鼎，《说文》云：“鼎，象析木以炊。”考古发现商代陶鼎或铜鼎，有的底下留有烟炱痕，是为炊器，但有的没有，是作食器或盛器用的。殷墟西区 1713 号墓出铜鼎四件，里面装有动物骨头[2]。郭家庄发掘的一座中型贵族墓 M160，所出的一件带提梁四足方鼎，尚留有未完全腐烂的肉食[3]。殷墟还出过一件铜鼎，里面装有已炭化的梅核[4]。可见，鼎有炊、食、盛多种实用功能。

上述各类型陶器在殷墟四期中的分布情况是：

殷墟文化一期，墓葬随葬的陶器有觚、爵、豆、鬲、簋、罍、壶、圆陶片、纺轮等。一期墓葬发现少，陶器种类也少。这一时期的墓葬多零星发现，一些墓地不见这一时期的墓葬，如郭家庄和殷墟西区两大墓地。

[1]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 年第九册，31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 年 8 期，705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发掘一商代贵族墓》，《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 月 20 日。
[4] 佟屏亚：《梅史漫话》，《农业考古》1983 年 2 期，243 页。

殷墟文化二期，墓葬随葬陶器有觚、爵、豆、盘、鬲、簋、罍、罐、埙、陶圆饼等。与一期相比，二期陶器的种类没有大幅度增加。大多数墓区都有这一时期的墓葬，象殷墟西区墓地，二期墓葬 74 座，陶器大多为觚、爵、豆、鬲、簋，如西区第一区 M423 [1]。郭家庄墓地，二期墓葬 14 座，陶器多为觚、爵、豆、鬲、簋。花园庄东地 M54 [2] 是最近几年来发现规格较高的墓葬，其时代属殷墟文化第二期。该墓保存完整，墓中出土有陶器觚、爵、豆、鬲、簋、罍，同时出有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随葬品。

殷墟文化三期，墓葬随葬陶器有觚、爵、豆、盘、鬲、簋、罍、罐、觯、瓿等。第三期陶器种类较前二期稍有增多，各个墓地基本上都有第三期的墓葬。西区墓地，第三期有墓葬 189 座，陶器多为觚、爵、鬲、簋、罍等，如西区第二区 M74 [3]。郭家庄墓地，第三期有墓葬 56 座，陶器多为觚、爵、豆、盘、鬲、簋、罐、罍。郭家庄 M160 是该墓地中规格最高、随葬品出土最多的一座墓，此墓出有陶器觚、爵、豆、簋、罐和罍 [4]。

殷墟文化四期，墓葬随葬陶器有觚、爵、豆、盘、鬲、簋、罍、罐、觯、瓿、卣、尊、斝、盂、甑、甗、小瓶、小罐、小壶、盆等。此期陶器数量明显增多，陶器种类也相当丰富。西区墓地，第四期有墓葬 434 座，占整个西区已发掘墓葬总数的一半多。陶器种类较多，这一时期，西区的多数墓葬中都出有陶小罐、陶小壶、尊、罍、盆。其它墓地第四期的墓葬均较前三个期别的墓葬多，象郭家庄墓地，第四期有墓葬 67 座，占整个墓地墓葬总数的三分之一强，陶器多为觚、爵、豆、盘、鬲、簋、罍、罐、觯、尊。

从众多殷墟墓葬出土的陶器种类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器物种类的变化规律，即殷墟文化早期（一、二期）器物种类少，组合简单，觚、爵、豆、簋、鬲多见，少见或不见盘；晚期（三、四期），盘大量出现，豆少见甚至消失，新出一些器形，象壶、觯、尊、鼎、瓿、小壶、小罍等器。此外，殷墟文化晚期，墓葬中随葬的有些器物数量不止一件，有的甚至达到十几件，这在早期是较为罕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122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 54 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 年 1 期，18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125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 160 号墓》，《考古》1991 年 5 期，391 页。

见的。

除以上介绍的实用器外，另有一些明器化陶器和仿铜陶器。明器化陶器有觚、爵、鬲、簋、罍等，仿铜陶器有觚、爵、鼎、尊、卣、斝等。明器主要有明器化铜礼器、明器化铅器和明器化陶器。仿铜陶礼器是陶器明器化的结果，同时又是铜礼器明器化进一步发展演变的结果。从历次墓葬的发掘中，我们发现，明器化陶器在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墓葬中已经出现，至殷墟文化第四期，以明器或明器化陶器随葬的现象更加突出。这些明器化器物，其器形相当小，制作粗糙，胎壁极薄，多素面（个别的有极简单的纹饰），显然是为墓葬中随葬用的。而仿铜陶器多出现在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墓葬中，尤其是第四期偏晚阶段，墓葬中多见成组的仿铜陶器。

殷墟时期，除了普通泥胎陶外，还出土了一些用高岭土烧制的陶瓷器，诸如白陶、硬陶和原始瓷器(又称为釉陶)。这三种器物多为容器，它们的物理性能相当好，细腻坚硬，烧成温度高，比较实用、耐用，但其制作工艺要求较高，因此，这些器物在墓葬中并不象普通陶器那样大量出现，在规格较低的小型墓葬中更是少见。

白陶是较珍贵的器物，在殷墟发掘中，它主要出现在西北冈大墓和小屯东北地宫殿区内的几座较大的长方形竖穴墓中。学术界多认为，白陶是王室及高级贵族的生活用具。其器类有豆、簋、罍、壶、甑、斝、觯、大口尊等。豆和大口尊与灰陶豆、尊的形制接近，其它器物多仿铜器制作。商代早期白陶多素面，后期则多雕刻有精美的纹饰，如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据已往发掘资料，30年代在侯家庄西北冈的大墓和小屯少数较大的竖穴墓中，共出土完整和可复原的白陶容器10多件，陶埙1件，残片660多片[1]。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内共出白陶卣、罍、尊、盘、皿等残器10件，残片数10片[2]。1984年秋季，在武官村北地发掘的一座甲字形大墓（即传出司母戊大鼎的墓），此墓中共出有白陶90余片[3]。后冈墓地曾出土过完整的白陶罐等[4]。

[1] 李济：《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56年，13页。
[2]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27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1期，105页。
[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22页。

硬陶在殷墟文化早、晚期的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均有发现，但为数少。硬陶与一般泥质陶相比，其胎质细腻、坚硬、吸水性小、扣击时会发出金石声。其器类有瓿、豆和罐等。妇好墓中出有三件硬陶罐[1]。另外，1976 年在小屯西地 M229 内发现硬陶瓿一对[2]。

原始瓷器，过去被称为“釉陶”[3]。这类陶器的胎质细腻，呈白色或灰白色，坚硬，扣击有金属声，吸水性小，表面有一层釉，称为釉陶。又因与瓷器有区别而显示出原始性，因此，称为“原始瓷器”。此类器多见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其器类有尊、豆、瓿、罐、壶和器盖等，其中以尊形器为常见。30 年代在安阳的 HPKM1380 中出土一件原始瓷器瓿[4]。1975 年出土一件小壶，器表施深绿色釉[5]。

（二）墓葬与居住址陶器种类比较

居住遗址内日用陶器种类较多，主要有鬲、甗、甑、簋、豆、盂、小钵、盆、尊、壶、罍、罐、盘、瓮等。其中比较常见，变化也比较明显的有鬲、簋、豆、尊、甑和盆。居住遗址内的陶器都是实用器，有些器物在其腹部及底上，往往留有烟炱痕迹，其中有的还装有动物的肢骨，有的则盛装有液体，可能是酒器，这些器物显然是实用器。居住遗址内第一、二期陶器类别、形制比较接近。见于第一期的器皿第二期绝大多数仍然存在，只有少数器物形制有较明显的变化。第三期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变化，第一、二期常见的小形鬲已不见，陶鬲和簋出现了新的类型，红陶罐成为较常见的器形。到第四期变化最为显著，第一至三期常见的簋、豆、圜底尊基本消失，同时第四期新出现一种较别致的小壶、小罐，为数不多，也见于墓葬中。

殷墟墓葬中出土的豆、鬲、簋等日用陶器，与居住遗址内所出陶器种类基本相同。墓葬中常见的随葬陶器有觚、爵、鬲、豆、簋、罐、盘、卣、鼎、尊、甗等。以觚、爵为最常见，是随葬品组合的核心。而觚、爵少见或不见于居住遗址中。同时，殷墟墓葬中多出明器化陶器和仿铜式陶器，尤其在殷墟文化第四期，明器化陶器和仿铜陶器随葬的现象非常普遍。这些器物大多没有实用价值，而是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
[2]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 年 1 期。
[3] 安金槐：《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文物》1960 年 8、9 期，68 页。
[4] 李济：《殷墟陶器图录》，1947 年。
[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5 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考古》1976 年 4 期。

一种象征性的器物，是专为墓葬中随葬用的。墓葬中随葬成组的仿铜陶器，以1962年在大司空村东南地发掘的53号墓出土的仿铜陶器较多，有鼎、簋、斝、卣、尊等，并与觚、爵、小形盘共存[1]。殷墟墓葬中出土的仿铜陶器都是明器，烧成温度低，极易破碎。

二、殷墟墓葬陶器组合及其特征

本文对解放以来已发表的殷墟随葬陶器的墓葬（本文讨论的墓葬不包括人殉墓、人祭墓、陪葬墓、儿童墓、奴隶墓、奠基墓或祭祀坑）进行了初步统计，共计1900多座（包括一些被盗墓，由于盗墓者多关注墓内的青铜器、玉器，而对陶器则“漠不关心”，因而即使被盗，其陶器组合也相对完整，本文统计时未剔除被盗墓葬）。能进行分期的墓葬总共有1370座。其中殷墟一期15座，二期159座，三期390座，四期806座（见表一，本文统计的多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表资料较完整且年代又比较清楚的墓葬所出的陶器，可能还有少量零星的墓葬中陶器未统计在内，这里加以说明）。

（一）殷墟文化一期墓葬陶器组合

目前，考古工作者发掘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的墓葬较少。第一期墓葬主要分布于苗圃北地、武官村北、大司空村、小屯北地、薛家庄[2]及后冈[3]等地。第一期共有墓葬15座，分10种组合形式：

（1）觚、爵、鬲，4座，见于苗圃北地M98、M112、M118、M123[4]

（2）鬲，2座，见于苗圃北地M212、大司空村第一区M107。

（3）鬲、豆，2座，见于苗圃北地M248、M262。

（4）鬲、簋、罐、盂，1座，见于59武官北M1[5]。

（5）鬲、壶，1座，见于后冈71M5。

（6）觚、爵、豆，1座，见于苗圃北地M58。

（7）鬲、簋、罍，1座，见于大司空村北M82。

---

[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62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8期，383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20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安阳后冈殷墓发掘》，《考古》1972年3期,14页。

[4]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2期，136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3期，226页。

（8）觚、豆、盘，1座，见于薛家庄83M1[1]。

（9）盆（另出圆陶片、纺轮），1座，见于三家庄M3。

（10）觚、爵、斝，1座，见于三家庄M4。

从以上的统计中看出，殷墟文化一期之时，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组合尚未形成定制，陶器数量少，器物种类简单，基本陶器有鬲、豆、簋、罐、觚和爵等。组合方式无规律可循，觚、爵配套组合的比例小，15座墓只有6座随葬陶觚爵组合，有些只见觚无爵，薛家庄83M1中只出觚而未见爵即是很好的例证。但仍可发现，鬲在组合中使用较为频繁。15座墓葬有11座随葬有鬲，占殷墟文化一期墓葬总数的73.3%，其次是豆，共有4座墓使用了5件豆。酒器斝出现在殷墟文化一期的墓葬中，且与觚、爵配套。例如三家庄M4[2]，出土陶觚、爵、斝各一件。这是此时特有的组合方式，此后消失不见。用觚、爵与斝随葬与郑州二里岗商代墓葬随葬器物的组合接近，斝与爵的形制有较早的特点。

有学者把殷墟一期分为早段和晚段。殷墟一期早段的墓葬有三十年代在小屯发掘的M232、M333、M388、M331以及在三家庄的几座墓葬。殷墟一期晚段的墓葬有小屯M188、M197、M164、M222、M14。小屯范围之外，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武官村北地发现这一时期的墓葬较多。

殷墟一期早、晚两段在墓葬陶器组合上基本相同，但也有一些区别，一期早段的陶器墓中尚使用陶斝，晚段以后，一般不再用陶斝随葬。一期早段的日用陶器中，有不少是一期晚段已不用或很少用的。早段陶豆是假腹豆，豆柄粗而较高。陶爵，上翘长流，腹下部圆鼓。晚段陶豆是真腹豆，豆柄粗而较矮；陶爵，流明显变平，腹下部外鼓弧变小[3]。

（二）殷墟文化二期墓葬陶器组合

殷墟文化二期墓葬较一期明显增多，主要分布在殷墟西区[4]、后冈[5]、郭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薛家庄东南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86年12期，1068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的发掘》，《考古》1983年第2期，130页。

[3]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年10期，930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27页。

[5]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25页。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16页。

家庄[1]、殷墟南区[2]、小屯西北地[3]、大司空村、小屯西地、苗圃北地[4]等地。第二期共有墓葬159座，分16种组合形式。

（1）鬲，29座，见于苗圃北地、大司空村、后冈、殷墟西区。

（2）豆，18座，见于小屯西地、王裕口西、白家坟西、后冈、殷墟西区、刘家庄南等。

（3）簋，1座，见于大司空村M29[5]。

（4）觚、爵，9座，见于郭家庄、殷墟西区。

（5）觚、爵、簋，8座，见于郭家庄、后冈、薛家庄。

（6）觚、爵、豆，21座，见于大司空村、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个别加盆如小屯西北地M18[6]。

（7）豆、鬲，4座，见于后冈。

（8）豆、簋或豆、罐或豆、觚，6座，见于殷墟西区。

（9）觚、爵、豆、鬲，7座，见于苗圃北地、郭家庄、殷墟西区。

（10）觚、爵、簋、罐或加豆，4座，见于殷墟西区。

（11）觚、爵、鬲，1座，见于苗圃北地。

（12）爵、罐（埙、陶圆饼），1座，见于小屯西妇好墓M5[7]。

（13）豆、鬲、罐，1座，见于大司空村。

（14）豆、盘，1座，见于大司空村M539[8]。

（15）觚、爵、豆、鬲、簋或加罍，2座，以花园庄东地M54[9]为代表。

（16）觚、爵、豆、簋或加罍，2座，见于郭家庄、戚家庄东和小屯，以小屯M17[10]为代表。

殷墟文化二期墓葬较一期相对增多，陶器种类也有所增加，基本陶器有觚、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59～177页。

[2]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3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491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203页。

[5] 谷飞：《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2715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6期，515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花园庄54号商代墓葬》，《考古》2004年1期，8页。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爵、豆、鬲、簋、罐等。苗圃北地墓葬以鬲为主要随葬陶器，有单件的鬲或豆或簋；组合有觚、爵、鬲；觚、爵、豆、鬲，个别出现觚、爵、鬲加盘的。小屯西北地发现的第二期墓以觚、爵、豆为基本组合形式，有的加簋、罍[1]。殷墟西区所发掘的第二期墓，数量较多，组合形式也多样。单一件的有豆或鬲，以一件豆的占多数；豆配觚、爵的也较多，有的另加鬲或鬲、簋或鬲、罍，有的加尊或罐，个别的加盘。另有鬲、觚、爵加盘的[2]。大司空村遗址内第二期墓葬为数不多，单一件的有豆或鬲，也有豆加觚、爵的[3]。1984 年发掘的甲字形大墓 M260[4]，传说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出土于此墓中，该墓出陶鬲、簋、尊、盆。尊、盆在第二期墓中比较少见，此墓是一特例。总的看来，多数墓地以豆为最常见，豆、觚、爵是最基本的组合形式，多数墓地中的墓葬均随葬这一组合。另有的另加鬲或罍。盘始见于第二期墓葬，但为数极少。觚、爵较第一期普遍，该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多有觚、爵伴出。

（三）殷墟文化三期墓葬陶器组合

殷墟文化三期墓葬较前二期多，主要分布在梅园庄、小屯西地、苗圃北地、白家坟西、孝民屯、北辛庄、大司空村、后冈、殷墟西区、郭家庄、殷墟南区等地。第三期有墓葬 390 座，分 35 种组合形式。

（1）豆，46 座，见于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西、大司空村、后冈、殷墟西区、刘家庄北。

（2）鬲，32 座，见于苗圃北地、孝民屯、后冈、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3）簋，20 座，见于郭家庄、后冈、殷墟西区。

（4）爵，6 座，见于梅园庄、小屯西地、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5）觚，5 座，见于白家坟西、孝民屯。

（6）盘，2 座，见于梅园庄。

（7）瓿，2 座，见于大司空村。

（8）觚、爵、豆，69 座，见于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西、北辛庄、郭家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 年 4 期，510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61 页。

[3] 马得志、周永珍、张云鹏：《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 年，33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 259、260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 年 1 期，99 页。

后冈、殷墟西区、刘家庄北。

(9) 觚、爵、簋，33座，见于梅园庄、小屯、孝民屯、殷墟西区。

(10) 觚、爵，32座，见于梅园庄、白家坟西、孝民屯、郭家庄、殷墟西区。

(11) 觚、爵、豆、簋，11座，见于郭家庄、殷墟西区、刘家庄南。

(12) 豆、鬲、簋，8座，见于殷墟西区。

(13) 觚、爵、盘、簋，8座，见于梅园庄、郭家庄、大司空村，小屯。

(14) 觚、爵、盘，7座，见于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西、孝民屯、大司空村、郭家庄、殷墟西区。

(15) 觚、豆，7座，见于殷墟西区。簋、罐或簋、盘，见于郭家庄和刘家庄南。

(16) 豆、鬲，5座，见于殷墟西区、后岗。

(17) 觚、爵、鬲，6座，见于小屯西地、殷墟西区。

(18) 豆、簋，4座，以郭家庄M7[1]为代表。

(19) 觚、爵、鬲、簋，4座，见于白家坟西、大司空村。

(20) 觚、爵、豆、盘，4座，见于梅园庄。

(21) 觚、爵、豆、鬲，3座，见于殷墟西区。豆、盘、罐，见于郭家庄、后冈。

(22) 觚、爵、盘、簋、罐，3座，见于大司空村。

(23) 觚、爵、豆、罐，3座，见于殷墟西区。盘、簋加罍或加盆，有郭家庄。

(24) 觚、爵、簋、罐，2座，见于孝民屯和郭家庄。

(25) 觚、豆、簋，2座，见于郭家庄。

(26) 觚、爵、豆、鬲、簋、罐，2座，见于殷墟西区和小屯。

(27) 觚、爵、豆、鬲、簋、罍，2座，见于白家坟西。

(28) 鬲、簋，2座，见于后冈。

(29) 觚、爵、罍加豆或加簋，3座，见于大司空村。

(30) 觚、爵、豆、簋、罐加鬲或加罍，3座，见于戚家庄M269[2]、梅园庄、郭家庄M160[3]。

(31) 豆、簋加盘或加鬲或加罐，3座，见于殷墟南区、大司空村，后冈。

(32) 觚、爵、盘、鬲加簋、罍或加豆、瓿，2座，见于小屯西地。

---

[1] 杨锡璋：《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考古》1988年10期，2684页。

[2]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殷墟戚家庄269号墓》，《考古学报》1991年3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21页。

（33）豆、鬲、簋、罐，1座，见于殷墟西区。

（34）觚、爵、盘加鬲、罍或加豆、鬲、罐，2座，见于大司空村。

（35）觚、爵、豆、簋加鬲或加罍，2座，见于刘家庄南和殷墟西区。

殷墟文化第三期，陶器种类增多，新出的器类有瓿、觯、盆等。陶器组合形式多样，其组合多以觚、爵或觚或爵与其它器物的搭配，觚、爵组合已成定制。觚、爵、豆数量大量增加，是整个第二期墓葬数量的三倍多。本期新出觚、爵、盘组合，数量不多，但这一组合在第四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现，达90座。

第三期墓葬，在苗圃北地随葬单一鬲或豆的占比例较大，鬲加觚、爵的也很常见，簋加觚、爵的很少。殷墟西区墓地，豆占比例较大，有40座墓葬随葬觚、爵、豆组合。簋较常见，簋加豆加觚、爵的组合形式也很普遍。罐成为墓内常见的器皿，盘仍较少见[1]。大司空村遗址内第三期墓葬，单一件的有豆或鬲，但为数甚少，另有簋、豆；鬲、豆。以豆或簋加觚、爵的较多，也有簋、豆、觚、爵，或加罐，个别的随葬豆、簋、盘、罐、觚、爵，或另加鬲[2]。此墓地用簋、豆随葬的很普遍，而鬲较少。

（四）殷墟文化四期墓葬陶器组合

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数量约是第三期墓葬数量的两倍。第四期墓葬主要分布在梅园庄、小屯西地、苗圃北地、张家坟、王裕口西、白家坟西、孝民屯、北辛庄、后冈、大司空村、郭家庄、殷墟西区、梯家口[3]等地。第四期有墓葬806座，分38种组合形式。

（1）鬲，42座，见于苗圃北地、白家坟西、后冈、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2）盘，29座，见于梅园庄、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

（3）簋，25座，见于梅园庄、后冈、郭家庄、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4）爵，16座，见于殷墟西区。

（5）觚，13座，见于梅园庄。

（6）罐或小罐，9座，见于郭家庄。

（7）豆，9座，见于大司空村。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 A：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34页。
B：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年春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3] 孟宪武等：《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1期，2773页。

(8) 觚、爵、盘，90 座，见于梅园庄、白家坟、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梯家口等地。

(9) 觚、爵、盘、罐，53 座，见于白家坟、孝民屯、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

(10) 觚、爵，43 座，见于梅园庄、小屯西地、王裕口西、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

(11) 觚、爵、鬲，27 座，见于梅园庄、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12) 觚、爵、盘、簋、罐，28 座，见于殷墟西区、郭家庄、大司空村。

(13) 觚、爵、盘、簋，18 座，见于白家坟西、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

(14) 觚、盘，14 座，见于白家坟、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盘、罍或盘、豆或盘、鬲，见于殷墟西区。

(15) 觚、爵、簋，15 座，见于梅园庄、北辛庄、郭家庄。

(16) 盘、罐，5 座，见于殷墟西区。

(17) 觚、爵、盘、罐加豆或加鬲或加簋，14 座，见于梅园庄 M1[1]、殷墟西区、刘家庄。

(18) 觚、爵、豆，10 座，见于大司空村，梅园庄、殷墟西区。

(19) 觚、盘加罐或加簋，4 座，见于梅园庄、白家坟。

(20) 觚、爵、盘、罐、罍，2 座，以刘家庄北 M1046[2]、殷墟西区 M1713[3] 为代表。

(21) 觚、爵、鬲、簋、罐、罍、觯，1 座，见于郭家庄 M1[4]。

(22) 爵、盘、罐，3 座，见于苗圃北地。

(23) 盘、簋、罐，3 座，见于苗圃北地、大司空村。

(24) 豆、盘加鬲或加簋，3 座，见于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25) 豆、盘、簋、罐，1 座，见于刘家庄南。

(26) 觚、爵、盘、鬲、簋加罍或加罐，8 座，见于小屯西、郭家庄、戚家庄东。

---

[1] 郭鹏：《河南安阳梅园庄西的一座殷墓》，《考古》1992 年 2 期，2787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 1046 号墓》，《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文物出版社，2004 年，363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发掘》，《考古》1986 年 8 期，703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 年 8 期。

（27）觚、爵、豆、盘，5座，见于殷墟西区。

（28）盘、簋、罐，3座，见于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殷墟西区。

（29）觚、爵、鬲、簋，1座，见于张家坟、殷墟西区。

（30）觚、爵、盘、鬲、簋，4座，见于郭家庄、殷墟西区。

（31）觚、盘、簋、罐，3座，见于殷墟南区。

（32）觚、爵、盘、鬲，3座，见于白家坟、后冈、殷墟西区。

（33）觚、爵加豆、簋或加盘、罍，17座，见于郭家庄。

（34）爵、盘、簋、罐，3座，见于后冈。

（35）觚、爵、盘、罐、觯，2座，见于殷墟西区。

（36）觚、爵、簋、罍、鼎、罐、卣、尊、斝，1座，见于小屯西地。

（37）觚、爵、盘、簋、罐、尊、觯，1座，见于梅园庄。

（38）盘、鬲、簋、罐、罍、尊或鬲、簋、小罐、罍、尊，2座，见于郭家庄。

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数量大量增加，墓葬中的陶器组合形式多样，觚、爵与其它器物的搭配组合仍是其组合的核心。第四期新增加一些器类，有小瓶、小罐、小壶、器盖、觯、甗、鼎等。这些新出现的器类多见于殷墟西区第四期的墓葬中。第四期，豆和簋少见，尤其是豆有被盘取代的趋势。随葬觚、爵、盘组合的墓葬有90座，而觚、爵、豆组合较第三期有明显减少，本期只有10多座墓葬随葬这一组合。

苗圃北地单件鬲的已不多见，鬲加觚、爵成为常见的组合形式，盘、觚、爵也较多。白家坟西地以觚、爵、盘或加簋为多见。殷墟西区墓以觚、爵、盘最为普遍[1]，有的加簋或加罐数件[2]。少数则有觚、爵、盘、簋、罐等多件陶器。大司空村墓葬，单一件的有豆或鬲或簋，簋、盘；簋、鬲；簋、罐配觚、爵的也有发现，以簋、盘共存的为数最多，簋、盘、罐加觚、爵的也较普遍[3]。小屯西地也有以鬲、簋、盘、觚、爵与罐多件随葬的，与大司空村某些墓葬中的陶器组合较接近。

以上是对殷墟不同地区各个时期的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分析。殷墟以外地区所见晚商墓葬，其随葬品组合与殷墟商墓相比较，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就各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3]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45页。

地随葬的陶器墓，其使用随葬品的组合情况与殷墟差异较大。殷墟墓葬随葬品以陶觚和陶爵较常见，但陶觚和爵二器在殷墟以外地区并不盛行。如罗山后李晚商墓地[1]平民墓葬中多随葬鬲、簋、罐，没有一座墓随葬陶觚、爵。西安老牛坡晚商墓[2]中则流行鬲、罐两类陶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发现五座墓，其随葬的陶器中未见觚、爵，但随葬的青铜器组合有觚、爵、斝，个别墓中有鼎[3]。这些组合特征与殷墟地区大不相同。反映出晚商都邑之外地区的普通平民的葬俗更重视食器而不是酒器。

铜器组合方面，殷墟以外地区，各地所随葬的铜器多有觚、爵，有的另加尊、觯、卣、觥等，显然是以觚、爵为核心的“重酒的组合”，这一点与殷墟相似。反映了以王都为中心的地区对周边文化的影响。

三、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分类

殷墟近二千座墓葬中出土的陶器种类有：觚、爵、豆、鬲、簋、罐、瓿、鼎、斝、罍、尊、卣、盂、甑、甗、壶、瓮、觯、盉、盆，共20种。这些器物按其功能或用途不同大体分为：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其中酒器有觚、爵、尊、斝、卣、觯、罍等；炊食器有豆、盘、簋、罐、盂、鬲、甑、甗等；盛贮器有瓿、壶、盆、鼎、瓮、小壶等。另外，殷墟文化第四期晚段，出现了大量的仿铜陶器，如觚、爵、鼎、簋、斝、尊、卣等。

依据上述器物不同的组合形式，我们将其组合分为以下几类：酒器组合类；炊食器组合类；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类；盛贮器组合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类；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类；仿铜陶器组合类（见表三）。

（一）酒器组合类

殷墟文化一期墓葬中的酒器发现极少，但三家庄M4出有一套完整的陶觚、爵、斝酒器，这是迄今殷墟发现的惟一一套属于这一时期的陶酒器。而这一时期

[1] A.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B.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周墓地第二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1年4期，4页。
C.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2期，174页。
D.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后李商周墓地第三次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8年1期，14页。

[2]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4页。

[3] 河北省博物馆等：《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8期，46页。

墓葬中的铜器组合，酒器占绝大多数。第二期墓葬中陶酒器亦不多见，共有 10 座墓随葬酒器类组合，分 2 种组合形式。单件的觚在大司空村发现，觚、爵配套的在郭家庄和殷墟西区发现，其它地区仍不多见。到了殷墟文化第三期，酒器大量增加。这一类组合的墓葬约有 50 座，分 4 种组合形式。单一件的有觚；爵；罍三种形式，主要分布在白家庄西、孝民屯、梅园庄、小屯西地、后冈、殷墟西区。觚、爵配套的在梅园庄、白家坟西、孝民屯、郭家庄、殷墟西区等地发现。殷墟第四期墓葬中的酒器数量大量增加，酒器种类也多样。有 74 座墓葬随葬酒器类组合，分 4 种组合形式。单一酒器组合的有觚、爵；爵、罍；觚、爵、觯，这些组合在梅园庄、小屯西地、王裕口西、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等地有所发现。单一件酒器的有觚；爵；罍三种形式，主要分布在梅园庄、殷墟西区等地，这种单一觚或单一爵组合形式的出现打破了数百年来"觚、爵"配制的传统。总之，这一类组合的墓葬在各个期别的分布是第一、二期数量相当少，第三、四期数量稍有增加。

（二）炊食器组合类

殷墟文化一期墓葬，炊食器类组合的墓葬有 5 座，分 4 种组合形式。单件的有鬲，分布在苗圃北地和大司空村。组合的有豆、鬲；鬲、簋；鬲、罐，主要分布在苗圃北地、武官北、后冈等地。第二期，有 60 座墓葬属于这一组合，分 11 种组合形式，单件的有豆；鬲；罐，主要分布在小屯西地、王裕口、白家坟西、后冈、殷墟西区、大司空村等地。组合的有豆、鬲；豆、簋；豆、罐；豆、盘；豆、鬲、罐；豆、簋、罐，其中大司空村的一座墓 M663[1]，随葬品有豆、簋、盂、盘。代表这些组合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后冈、殷墟西区、大司空村等地。第三期，有 128 座墓葬，分 16 种组合形式，单件的有豆；盘；鬲；簋，主要分布在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大司空村、后冈、殷墟西区、孝民屯、郭家庄等地。组合的有豆、簋；鬲、簋、罐；盘、罐；簋、罐；盘、簋；豆、罐；豆、鬲；豆、簋、罐；豆、盘、罐；豆、鬲、罐；豆、鬲、簋；盘、簋、罐；鬲、簋、罐；豆、盘、簋；豆、鬲、簋、罐，主要分布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郭家庄、后冈、小屯西等地。到了殷墟文化第四期，有 157 座墓葬，分 24 种组合形式。这一时期，单件炊食器的有豆；盘；鬲；簋；罐共 5 种形式，主要分布在苗圃北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司空村东南的一座殷墓》，《考古》1988 年 10 期，865 页。

地、郭家庄、殷墟西区等地。单一炊食器组合的有盘、鬲；盘、罐；鬲、罐；豆、盘、鬲；盘、簋、罐；豆、盘、簋、罐；盘、鬲、簋、罐等，主要分布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刘家庄南、苗圃北地等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仅随葬炊食器组合的墓葬较酒器类有所增加，但数量仍不多。多数墓葬中的随葬品是以炊食器和酒器相配套。但这些炊食器组合形式的出现，当是对数百年来商人重酒习俗的挑战。

（三）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类

此类墓葬发现较多。殷墟文化一期，这种组合形式的墓葬只有 7 座，其中觚、爵、鬲和觚、爵、豆两种组合的墓葬有 5 座，均在苗圃北地[1]。第二期以后，绝大多数墓葬随葬有酒器和炊食器组合。属于此种类型组合的墓葬，主要分布在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西、孝民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王裕口西、北辛庄[2]、殷墟西区[3]、郭家庄[4]、后冈[5]等地。

殷墟文化二期，有 84 座墓葬随葬酒器和炊食器类组合，分别是觚、爵、豆；觚、爵、鬲；觚、爵、簋；觚、爵、豆、鬲；觚、爵、簋、罐；觚、爵、豆、鬲、簋或加罍，这些组合的墓葬主要分布在大司空村、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苗圃北地、后冈、薛家庄、小屯西北地。郭家庄 M26[6]是其典型，其陶器组合有觚、爵、簋、罐、鬲、罍。第三期，有 200 座墓葬，其组合有觚、爵、豆或加鬲或加簋或加罐；觚、爵、豆、盘或加簋或加罐；觚、爵、豆、簋、罐、或加鬲或加罍等，主要分布在梅园庄、小屯西地、白家坟西、北辛庄、郭家庄、后冈、殷墟西区、刘家庄北、孝民屯、戚家庄等地。第四期，有 531 座墓葬，较前面三个期别明显增多，其组合有觚、爵、鬲；觚、爵、簋；觚、爵、盘；觚、盘、罐；觚、盘、罐、簋；觚、爵、盘、罐、罍；觚、爵、鬲、簋、罐、罍、觯；觚、爵、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 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 2 期，123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年，231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27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1 页。

[5]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 3 期，25 页。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 年 5 期，16 页。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 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93 年 10 期，900 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 26 号墓》，《考古》1998 年 10 期。

鬲、簋；觚、爵、盘加簋或加罐或加鬲；觚、爵、豆、盘；觚、爵、罍、盘、鬲、簋等。主要分布于白家坟、孝民屯、后冈、郭家庄、殷墟西区、戚家庄东、刘家庄等地。

以上组合，觚、爵或其它任一种酒器与炊食器的搭配组合占相当大的比例，在各期中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四个期别中，属于这一组合类的墓葬有 822 座，尤其是第四期，达 531 座墓葬。可见，觚、爵等酒器占有的份量相当大。

（四）盛贮器组合类

这类组合在四个期别的墓中均有出现，但为数不多。第一期 1 座，组合为盆，在三家庄 M3 中出土。第二期 1 座，组合为盆，在后冈出土。第三期 2 座，组合均为瓿，在大司空村出土。第四期 5 座，组合有小罐；小瓶；瓿 3 种形式，在郭家庄、西区、后冈出土。

（五）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类

此类组合在殷墟文化第一、三、四期墓中出现，第二期不见。第一期 1 座，为鬲、壶，在后冈 71M5 中出土。第三期 3 座，有罐、瓿；豆、簋、小罐；盘、簋、盆共 3 种形式，在大司空村和郭家庄出土。第四期 13 座，有簋、瓿；罐、盆；盘、簋、小罐；簋、壶；豆、簋、瓮等共 12 种组合形式，在西区、郭家庄、后冈和大司空村出土。

（六）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类

此类组合在殷墟文化第二、三、四期墓中出现。第二期 3 座，有鬲、簋、尊、盆[1]；豆、簋、罍、壶、盂；觚、爵、豆、盆 3 种组合形式，在大司空村和小屯出土。第三期 3 座，有觚、爵、豆、盘、鬲、瓿；觚、爵、盘、瓿；觚、豆、盆 3 种组合形式，在小屯和郭家庄出土。第四期 24 座，有鬲、簋、罍、尊、小罐；觚、爵、簋、罍、卣、尊、斝、罐、鼎；觚、爵、盘、盆；爵、盘、尊、壶、鼎；觚、爵、簋、罍、卣、尊、斝、鼎、罐；觚、爵、簋、罐、罍、盂、鼎等共 24 种组合形式。24 座墓葬均有自己独特的组合方式，这些组合类器物在郭家庄、小屯、西区、大司空村和苗圃出土。此外，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中出现了大量的陶小罐、小壶、盆等盛贮器，此类盛贮器和酒器、炊食器组合的墓葬在西区发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 259、260 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 年 1 期。

现较多。

（七）仿铜陶器组合类

殷墟墓葬中随葬的仿铜陶器出现在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墓葬中。此类仿铜陶器墓主要分布在殷墟西区、大司空村、苗圃、四盘磨、小屯、八里庄东、梅园庄、戚家庄和南区等地。依据这些仿铜陶器和其共出器物的出土情况，我们将其组合又分为四种小类型：仿铜陶器和陶器组合；仿铜陶器、青铜器和陶器的组合；仿铜陶器和青铜器的组合；单一仿铜陶器组合。据笔者统计，殷墟发掘的此类墓葬仅有十六座（见表二），下面分别对这些墓葬作一简单介绍。

仿铜陶器和陶器组合的墓有 11 座，其中殷墟西区 5 座，分别为 M4、M216、M1057、M1133、M1134 [1]，南区 2 座，为 M42、M54 [2]，八里庄东 1 座，为 M14 [3]，84 年苗圃 1 座，为 M129 [4]，80 年苗圃 1 座，为 M15 [5]，小屯西二区 1 座，为 M233 [6]。

M4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斝、尊、卣；陶器爵和罍。M216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斝、甗、尊；陶器觚、爵、盘、罍。M1057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斝、甗、罍、卣、觯；陶器觚、爵、盘、簋。M1133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斝、卣、觯、尊；陶器觚、壶、盘。M1134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卣、觯、尊；陶器盘、簋、壶。M42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鼎、盉、爵；陶器簋。M54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鼎；陶器簋。M14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爵；陶器觚、盘、鬲、簋、罍。M129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尊（见图五）；陶器觚、盘、罍、罐。M15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陶器罐、盂、罍。M233 的组合有仿铜陶器爵、鼎、簋、卣、尊、斝；陶器觚、卣、罍（见图四）。

仿铜陶器、青铜器和陶器组合的墓有 2 座，分别为 62 年大司空村 M53 [7]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121～146 页。
[2]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 年 3 期，2122 页。
[3] 贾玉俊、孟宪武、王素梅：《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 年 1 期，2834 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 年秋安阳苗圃北地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 2 期，124 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 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 2 期，121 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 年，第 233 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2 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简报》，《考古》1964 年 8 期，383 页。

和87年梅园庄M67[1]。M53的组合有仿铜陶器鼎、簋、卣、尊、斝；铜器觚、爵、觯；陶器觚、爵、盘。M67的组合有仿铜陶器簋、尊；铜器爵；陶器觚、爵、簋、盘、罐、小罐、觯和罍。

仿铜陶器和青铜器组合的墓有2座，分别为戚家庄东M63和八里庄东M52[2]。M63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觯；铜器觚、爵、鼎、簋、卣、壶、斝、罍。M52的组合有仿铜陶器觚、尊；铜器爵。

单一仿铜陶器组合的墓只有1座，为四盘磨M6[3]，其组合有仿铜陶器觚、爵、鼎、簋、斝、尊、卣、甗、罍、盉。

另外，郭家庄M208随葬的陶器有爵、盘、尊、壶、鼎，其中爵和尊是仿铜陶器。M75随葬陶觚、盘、簋，其中觚是仿铜陶器[4]。

上述仿铜陶礼器，其制作粗糙，装饰简单，显然不是实用器，而是象征性的明器。这些仿铜陶礼器的作用，在于使墓主人享受到生前因故不能享受的礼制待遇。

从以上组合的规律中看出，在七大类组合中，炊食器类组合在第一期占比例较大，酒器类和盛贮器类却很少。第二期墓葬随葬一、两件炊食器的仍较普遍，但随葬觚、爵等酒器的所占比例有所上升。第三期随葬酒器更为普遍，罍、罐也成为墓内较常见的器皿。到第四期时炊食器类和酒器类组合都不多，但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组合则大量增加，占有较大的比例。

对各类器物所作的统计发现，陶觚、爵或陶觚或陶爵与其它器物的组合在墓葬中所占的比例分别是：第一期6座，第二期61座，第三期205座，第四期446座。总共有718座墓的随葬品伴有陶觚、爵二器。可见，陶觚、爵组合是整个殷墟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核心。墓内随葬觚、爵等酒器之普遍，反映了殷人好酒之风晚期更加盛行。

此外，第四期墓中出现了大量仿铜陶礼器，其组合多有仿铜陶觚、爵、鼎、尊、卣、斝等。上面16座出有仿铜陶礼器的墓葬，其中有7座均随葬有仿铜陶觚、爵二器，约占整个仿铜陶器墓的43.8%，觚、爵相伴出现的频率依然相当高。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秋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2期。

[2] 孟宪武等：《殷墟南区墓葬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16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7页。

而且有个别墓葬，其墓室面积达 7.7 平方米（1985 年刘家庄南 M42），有棺有椁，殉三人一牛，椁盖上有帷帐一类的彩绘丝织物，显然不是一般的小型墓。由此说明，晚商时期，不仅小墓，甚至大型墓也随葬仿铜陶器。第四期出现的仿铜陶礼器，是殷墟文化第四期内涵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在组合研究上的作用与同其它陶器类基本相同。对于仿铜陶器出现的原因，在第五章的第三部分详述。

四、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源流

（一）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与早中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比较

已发现早商时期的墓葬多是零星的铜器墓和埋在居住址、城门或城墙附近以及手工业作坊内的小墓。早商时期的墓葬以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盘龙城、垣曲商城等遗址内发现的墓葬为代表。

早商时期的墓葬形式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这是当时居主导地位的一种埋葬方式。墓葬中随葬的陶质容器中，鬲的数量最多，其次为盆，豆居于第三位，再次为斝、罐、簋、爵，其它器类数量很少，这种组合显然是重食器的组合。铜器和陶器种类的不同，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各阶层生活重心的不同。在普通平民阶层，人们生活中所用的器物主要为食器，而在统治阶层中，生活的中心器类则是盛酒和饮酒类器。在级别较高的墓葬中，有时还随葬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其器形以尊类器为最多，当属贮酒器。

目前，郑州商城已发现的早商时期墓葬，分布较为零散，有几处墓区也只是相对集中地分布几座或十几座墓。在郑州商城铭功路西侧制陶遗址发现有二十多座属早商时期的墓。墓内随葬品多少不一，一般为 2—4 件，少者 1 件，最多的有 11 件。陶器组合以豆、鬲、斝、簋为主，有的兼有爵、盆、瓮等[1]。郑州商城城墙内侧发掘的一批墓葬，大多数没有随葬品，少数墓随葬有陶器数件不等，另外还发现有铜器、玉器、骨器、石器等[2]。在郑州烟厂、二里岗、杨庄、人民公园、北二七路、白家庄、东里路黄河医院等地也发现早商时期的墓葬。

商代二里岗下层时期的墓葬大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随葬有数量不等的陶器。陶器类别有鼎、鬲、斝、爵、簋、豆、尊、盆、盉和钵等，其中又以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 年 4 期，19 页。
[2] 河南省博物馆、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1，文物出版社，1977 年，9 页。

随葬鬲、斝和爵等陶器数量最多，约占各种陶器总数的60%，随葬豆、簋和盆等陶器的数量次之，约占各种陶器总数的30%，其它各种陶器的数量较少，占各种陶器总数的10%左右。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组合未形成定制，主要组合有盆、鬲、豆或加爵；豆、盆加鬲或加斝；鬲、斝、爵或加簋、豆、尊；鬲、尊、盆加簋或加斝、豆；豆、斝、盆、杯；鼎、簋；瓮、盆；鬲、簋、尊、盆；豆、罐；盆、鬲、钵；单一件的有鬲。

商代二里岗上层时期墓葬亦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内随葬的陶器有鬲、斝、爵、豆、簋、尊、盆、罐、罍和器盖等，其中以鬲、斝、爵、豆、簋的数量最多。随葬陶器组合并未形成定制，主要有鬲、簋或加豆；爵、豆或加盆；豆、盆；鬲、豆加斝或加盆；斝、鬲、觚；簋、斝、盆加豆、罍或加鬲、爵。单一件的有鬲；豆；爵；盆共4种形式。

另外，在偃师商城90年代的发掘中，共清理墓葬约40座[1]。这些墓葬的随葬品多是陶器，器形有鬲、盆、圆腹罐、簋、豆、鼎、壶、尊等。器物组合不固定，有鬲、盆、尊；鼎、簋、豆、尊；鬲、盆、豆、瓮；鬲、盆、斝；盆、瓮等组合，有的仅陶鬲一件。1998年发掘偃师商城小城，发现墓葬22座，随葬品多为陶器，其组合有单个陶鬲；或以陶鬲和簋为基本组合，再配以其它器物，如鬲、簋、盂；鬲、簋、盆；鬲、簋、盆、罐；鬲、簋、盆、爵、斝、豆；鬲、簋、豆、瓮等组合，还有以陶豆和簋为随葬品组合的墓葬[2]。

早商时期的墓葬具有较明显的等级区别，《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将这一时期的墓葬分为五种类型，下面简要叙述各类型墓葬出土的陶器组合。

第一类：以盘龙城李家咀M2为代表[3]，随葬的陶器有鬲、罐、带流小罐、夹砂红陶缸和印纹硬陶的尊、瓮等器。

第二类：有偃师商城83M1[4]，此墓内随葬有陶簋、陶方杯、圆陶片各一件。垣曲商城M1[5]，随葬陶器三件，有鬲、盆、圆陶片。

---

[1] A. 刘忠伏：《偃师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44页。
B. 刘忠伏：《偃师商城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221页。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6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小城发掘简报》，《考古》1999年2期。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上篇》，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52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

[5]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年，165～166页。

第三类：铭功路 M150 [1]，随葬陶鬲、斝、圆陶片、陶纺轮各一件。

第四类：垣曲商城 M3 [2]，随葬陶器鬲一件。

第五类：无随葬品。

以上五类墓葬从随葬陶器组合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状况。明显区别表现在第一、二类之间与第三、四类之间。第一、二类墓随葬成组的陶器，而第三、四类墓随葬陶器较少，第五类墓没有任何随葬品。陶器组合的种类和数量不同，反映了平民内部存在着相对的贫富差别。

中商时期的墓葬形制，同早商基本一致，仍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以木质棺椁作葬具，瓮棺葬较少见。有学者将中商文化分为三期，即中商一期、中商二期、中商三期 [3]。

中商一期之时，陶器器类有鬲、盆、豆、簋、圜底罐、大口尊等，所发现陶器墓仍以豆、鬲、簋、罐、盆、斝等炊食器为多见。中商二期保存了中商一期的基本器物，如鬲、盆、豆、簋、圜底罐、大口尊。此期陶器墓的组合较为稳定，鬲占大宗，如藁城台西墓葬，用单个鬲的占 66.7%，随葬单个陶深腹盆的约占 9.4%，其余以单簋、单豆随葬的均不足 5%。作为酒器的陶觚和陶爵仍较少在墓葬中发现。

中商三期陶器除承袭中商二期基本器类外，比较常见的还有平底盘、圈足盘、圜底盆。这一时期，墓葬随葬品组合方式受到地域传统等多方面影响，但从台西商墓情况看，使用单件陶鬲的比例下降，而使用盆或盘或簋等器比例上升。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安阳地区出现了随葬陶觚和陶爵等陶酒器的墓葬，如 1999 年发掘的 M10 随葬陶觚、爵、斝各 1 件，铜鼎 1 件，铜戈 2 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资料）。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将中商时期的墓葬分为五种类型，以下对各类型墓葬出土的陶器组合作个归纳：

第一类：以盘龙城李家咀 M1 和 M3 为代表。M1 随葬陶器有鬲、甗、豆等，原始陶瓷器有鼓腹尊、折肩尊。M3 被破坏严重，陶器有陶甗、残鬲、残瓮和原始瓷尊等少量器物。

---

[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 年 4 期。

[2]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商城》，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211～212 页。

[3] 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 年 4 期，396 页。

第二类：郑州白家庄 M3[1]，随葬陶器有涂朱圆陶片 1 件。郑州北二七路 M1[2]，陶器仅发现圆陶片 3 件。郑州北二七路 M2[3]，陶器有圆陶片 2 件、印纹硬陶尊 1 件。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4]，陶器有陶鬲、陶圈足、涂朱陶饼、原始瓷器残片。

第三类：郑州北二七路 M4[5]、铭功路 M146[6]。北二七路 M4，随葬陶器鬲、豆、爵、斝、纺轮各 1 件。铭功路 M146 随葬陶鬲、斝、爵、觚、饼各 1 件。

第四类：以山西夏县东下冯 M159[7]为代表。随葬陶器有陶鬲、盆、罐、豆各 1 件。

第五类：无随葬品。

这一时期的墓葬随葬陶器组合同早商基本相同。前三类墓葬随葬的陶器种类多，后两类墓葬随葬的陶器数量少，第五类则无任何随葬品。表明，贫富不均现象依然存在。

由以上分析，笔者发现，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与早中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

1. 早中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可能尚未有较为固定的形式。其组合有豆、盆、斝；爵、鬲、斝；鬲、尊、盆、簋；豆、斝、盆、杯；瓮、盆；尊、盆；豆、罐；爵、豆；豆、鬲、斝；觚、鬲、斝等多种形式。而晚商时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较为固定，殷墟一期之时，多为炊食器的组合；殷墟二、三、四期时，多以觚、爵、豆或觚、爵、盘或觚、爵与其它器物的组合。

2. 早中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多为炊食器而少酒器。其炊食器多有鬲、豆、盆、簋等，酒器只有少量的斝、爵。晚商时期，酒器数量相当多，一般墓葬都有酒器随葬。殷墟第四期时，虽然食器鼎、簋有所增加，但酒器仍是这一时期组合的核心，晚商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而非“重食的组合”。同时，早中商时期，墓葬中随葬有较多的圆陶片，而晚商时期少见或不见。

3. 早中商时期，墓葬随葬陶器的数量还较少，种类较晚商时期也显得单一。

[1]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0 期。
[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 年 3 期，67 页。
[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 年 3 期，74 页。
[4] 黄冈地区博物馆、黄州市博物馆：《湖北省黄州市下窑嘴商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 6 期。
[5]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商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 年 4 期。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市商代制陶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 年 4 期，13 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7 年，189 页。

早中商时期，陶器种类有爵、豆、鬲、簋、盆、斝、罐、钵，而晚商时期，种类大量增加，有觚、爵、豆、盘、鬲、簋、斝、罐、觯、盆、卣、尊、鼎、罍、瓿、甗、甑、壶、盂、瓶等多种。

4. 早中商时期，墓葬中随葬的觚、爵，其配套形式尚未形成定制。这一时期，爵多而觚少，两者配套出现的次数极少。另外，这一时期，觚、爵大多出现在遗迹中。晚商时期，觚、爵配套已成定制，且此两种器物多出现在墓葬中，遗迹中少见。

5. 早中商时期，墓葬中随葬的象觚、爵等器皆为实用器，而到晚商时期，这些器物可能是专为死者而作的，并非实用器。这类陶觚、爵已失去它原有的实用意义，而变为纯粹礼仪性的明器。此类器物火候极低，质量极差，制作粗糙，装饰简单。

6. 早中商时期,随葬铜器的墓葬一般不随葬陶器。晚商时期，随葬铜器的墓葬多伴有陶器共出。而且在这一时期，不仅中小型墓随葬陶觚、爵，大墓中也随葬一套陶觚、爵。

晚商和早中商时期陶器组合的区别表明，两者属于不同的时期。它们之间的联系表现在殷墟一期和中商晚期墓葬陶器组合方面。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较早阶段的墓葬仅在小屯、苗圃北地和三家庄发现。小屯东北地属于一期早段墓葬主要是 30 年代发掘的 YM232、YM333、YM388、YM331[1]。这些墓葬出有陶豆、尊、爵、盆、罐等。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墟一期墓葬陶器组合多为觚、爵、鬲，如 M98 和 M112。三家庄发现一座陶器墓 M4，随葬陶觚、爵、斝酒器组合。

殷墟文化第一期晚段的墓葬分布在小屯、苗圃北地、大司空村、武官村等地。小屯墓葬是在二、三十年代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发掘，如 M188、M197、M164、M222、M14 等，这些墓葬多随葬青铜器，其中 M14 随葬有陶豆、鬲、罍，铜觚、爵。苗圃北地属于这一时期的墓葬有 M118、M123、M106[2]。武官村的墓葬有 78HBM1 以及 59WGM1，这两座墓是殷墟文化第一期规格较高的墓葬[3]。这一阶段墓葬随葬品组合主要有豆、鬲；觚、爵、鬲；觚、爵、豆；鬲；豆。随葬品中不见早段

---

[1] 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觚、爵、鼎、斝形器之研究》均台湾出版。

[2] 郑若葵：《试论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墟一期墓葬陶器及相关问题》，《考古》1989 年 2 期，159 页。

[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侯家庄北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 2 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5 页。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的一座殷墓》，《考古》1979 年 3 期。

的陶斝。

对殷墟文化第一期和早中商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见图六），从中看出，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段与中商最晚段之间有着发展演变关系。殷墟第一期早段墓葬中的陶器组合的种类多上承早中商时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另外，早中商时期，尤其是中商晚期，墓葬中随葬圆陶片、涂朱圆陶片和陶纺轮比较常见，这一随葬风俗一直延续到晚商早期即殷墟文化第一期早段。殷墟一期墓葬中常见有随葬圆陶片的现象，但到殷墟更晚时期则不见。早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墓葬中就发现有圆陶片。此种圆陶片一般位于墓底中部两侧或墓主头部附近，正面涂朱或墨。有研究者认为，随葬这种圆陶片的墓葬，其墓主的身份地位相当高，圆陶片的多少和有无反映了墓主身份的高低[1]。笔者认为，墓中随葬圆陶片可能与当时的埋葬习俗有关，但这种器物所代表的含义，仍不清楚。但至少表明，殷墟时期墓葬随葬风俗起源于早中商时期。

（二）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与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的比较

西周时期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丰镐地区、陕西宝鸡斗鸡台[2]、长安沣西[3]、洛阳瀍西[4]、浚县辛村[5]、三门峡市上村岭[6]、北京房山黄土坡[7]等地。西周时期墓葬考古分期，因丰镐地区墓葬资料相对完整，以丰镐地区随葬陶器的分期为标准。《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将这一地区的墓葬分为六期[8]。

第一期以张家坡、客省庄为代表，陶器组合有鬲、罐；鬲、簋、罐，单一件的有鬲。第二期以张家坡为代表，陶器组合有鬲、簋、罐或加壶；簋、罐或加豆；罐、罍；鬲、罐；鬲、簋、尊；罐、盉，单件的有鬲；豆；簋；罐共4种形式。第三期以张家坡、云塘、贺家村为代表，陶器组合有鬲、罐或加瓿；鬲、簋、罐或加豆，鬲、罐、盂；簋、罐；豆、簋，单件的有鬲。第四期以花园村、普渡村、齐家村为代表，陶器组合有豆、罐；鬲、罐或加簋；鬲、簋、瓿、罍或加罐；豆、鬲、罐、盆；鬲、簋；鬲、罐、盂；豆、鬲、罐、簋、尊、卣、觚、爵、觯、

[1]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2] 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及其《图说》1948年北平版和中国科学院1954年版。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4] 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年10期，20页。
[5] 郭宝钧：《浚县辛村》，科学出版社，1964年，7页。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5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0年2期，237页。

盘，单件的有豆；罐；簋共3种形式。第五期以张家坡、上康村为代表，陶器组合有鬲、罐；豆、鬲、罐或加盂；鬲、罐、盂，单件的有鬲；罐共2种形式。第六期以新旺村为代表，陶器组合有豆、鬲、罐、盂；豆、罐、盂；豆、鬲、盂，单件的有鬲；盂2种形式。

西周墓葬中的陶器种类有豆、鬲、簋、罐、盂、壶、尊、瓿、盉。墓葬中的陶器种类没有遗址中的多，如某些罐、甗、瓮等在墓葬中不见。属于平民阶层的小墓一般只随葬鬲、盆、豆、罐等生活用陶器，不使用礼器。西周早期墓的随葬品，其陶器组合因地而异，最常见的是鬲、簋、罐，有的并加上豆，西安以西地区则少见簋、豆二器。数量不等，少则1件，多则10余件[1]。陕西长安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中小型墓M178出有陶鬲、簋、罐，同出铜鼎、簋、器盖、戈、锥、镞等器。这种组合形式和殷商晚期普遍随葬觚、爵的陶器组合形式是显然不同的。在器物形制方面，西周时期陶鬲的器形多作圆锥形空足或裆上部向里凹入的形式[2]，这不同于殷末的陶鬲。在陕西宝鸡、岐山发现的一种高领袋足鬲，发掘者认为是早于西周的，有称为是早周的，它往往单独随葬，有的和陶罐同出[3]。

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和铜器组合一样，以炊食器组合为主，酒器很少。其组合有鬲、簋、罐；鬲、罐、盂；豆、罐、盂；鬲、罐；簋、罐；豆、簋；鬲、簋等形式。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以觚、爵或觚、爵与其它器物的组合为主。这一区别表明，商代看重酒器的组合，而轻视炊食器的组合，西周却正好相反。这种墓葬制度的不同正反映了“殷礼”和“周礼”的区别，商代是“重酒器的组合”，西周是“重食器的组合”[4]。

上面介绍的是殷墟以外地区的西周墓葬。那么，殷墟地区西周时期的墓葬也不容忽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殷墟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多次调查，目前可以确认殷墟附近的西周文化遗址约有24处[5]：姬家屯、贾家庄、东夏寒、南士旺、柴库、秋口、小屯、刘家庄、三官庙、东官园、小八里庄、晁家村、东瓦亭、东崇固、开信、伯台、郭村西南台、杨贾村、大寒南岗、大寒屯、大裴村、东流台、沿村台。

[1] 叶骁军：《中国墓葬发展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4]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123页。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考古实验室：《洹河流域区域考古研究初步报告》，《考古》1998年10期。

有学者认为，上述绝大多数西周遗址的年代不早于西周中期[1]。这些西周遗址多不见报道。而见于报道的西周遗存只有殷墟范围内的刘家庄西周墓地一处[2]。刘家庄位于安阳小屯南约 2.5 公里。198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此发掘了 26 座西周墓葬。发掘报告认为这批墓的年代大体在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并将这批墓分为四期，其中属于第一期的墓有 M85、M135、M91、M97 等，其时代属成王后期。1999 年，安阳工作队又在刘家庄北地发掘一座殷代贵族墓——M1046[3]。该墓的时代为殷墟四期偏晚段，随葬的陶器组合有觚、爵、盘、罍、罐。

对上述有代表性的西周早期阶段墓葬所出陶器与殷墟第四期偏晚阶段墓葬所出陶器比较看（见图七），随葬品组合方面，殷墓的随葬品多以陶觚、爵为主，陶鬲和罐不多；西周墓的组合则以陶鬲、罐为主，不见陶觚、爵。虽然，殷周两代随葬陶器组合的核心不同，但从殷墟文化第四期偏晚阶段墓中出土的仿铜陶器组合上来说，却是同一的。这说明，西周王朝统治者所制定的礼制是从殷王朝统治者那里承继而来，并逐渐加以改革和发展而成，因此，孔子曰："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殷墟墓葬陶器组合与西周墓葬陶器组合有以下共性和差别：

1．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较为固定。其组合形式有鬲、罐；簋、罐；鬲、簋、罐或加尊；罐、罍；豆、鬲、簋、罐；鬲、罐、盂等。单件的有鬲；罐；豆。这种较为固定的陶器组合形式与殷墟时期基本相同。

2．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多炊食器而少酒器。其食器主要有豆、鬲、簋、罐、鼎等。而整个晚商时期，虽然在殷墟第四期出现了较多的像鼎、簋这样的食器，但酒器仍然是晚商陶器组合的核心。

3．西周时期，墓葬随葬陶器的种类不如晚商时期丰富。西周时期的陶器种类有豆、鬲、簋、罐、尊、盂、瓿、盆等，而晚商时期墓葬中的陶器种类多样，有觚、爵、豆、盘、鬲、簋、斝、罐、觯、盆、卣、尊、鼎、罍、瓿、甗、甑、

---

〔1〕唐际根、汪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15 集，2004 年，40 页。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殷墓与西周墓》，《考古》2005 年 1 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 1046 号墓》，《考古学集刊》第 15 集，2004 年。

壶等十多种。

4. 西周时期，大中型墓葬中不随葬或较少随葬陶器，以铜礼器为大宗。晚商时期，大墓中除随葬成套的铜礼器外，一般也有陶器共出，且陶器多为一套觚、爵。

5. 西周时期，偶有少量的墓葬除共存陶器外，另有陶礼器随葬，如 1978 年扶风齐家村 M19 出有陶礼器簋 2、尊 1、卣 1、觚 2、爵 2、觯 1、盉 1、盘 1 [1]。原报告作者认为，这些器物是仿铜红陶礼器。这种陶礼器可能和殷墟第四期墓中出土的仿铜陶礼器相类似，这充分说明殷墟墓葬陶器组合对西周时期陶器组合的影响。

殷墟时期和西周时期陶器组合方面的差别，说明两者属于不同的时期。尽管有差别，但两者的共性还是不容忽视的。两者的共性表明，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是由殷墟时期（陶器组合）演变而来的，也就是说，殷墟墓葬陶器组合对西周时期（陶器组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例如，殷墟时期，陶器组合较固定，这种较为固定的组合形式影响到西周时期，说明两者之间的演变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殷墟晚期，墓葬中多随葬大量的仿铜陶器和明器化陶器。这一随葬明器化陶器风俗一直影响到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期。这一时期，随葬的器物越来越多，且陶质越来越粗糙。

五、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商代社会生活

（一）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殷墟墓葬在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的基础上也分为四期，即第一、二、三、四期。不同的家族墓地，其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组合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当大的区别；即使在同一时期，各墓地之间也有着区别和联系，这就是陶器组合所表现的时代特征。上文第三部分分别对殷墟不同地区四个期别（第一期、二期、三期、四期）墓葬陶器组合作了归纳分析，同时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墓葬随葬陶器组合作了比较研究。依据上文的分析，笔者对殷墟墓葬中随葬陶器组合的时代特征概述如下：

---

[1] A.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79—1984 年。
B. 陕西周原考古队：《陕西扶风齐家十九号西周墓》，《文物》1979 年 11 期，4 页。

1．第一期和第二期墓葬数量少，随葬陶器数量也少，器物种类单一，组合形式单一。到了第三、四期时，墓葬数量增多，随葬陶器的数量随之增加，器物种类增多，组合形式多样，新器皿更多出现。具体表现为：第一期有墓葬 15 座，组合多为炊食器和酒器配套。第二期有墓葬 159 座，而第四期时增加到 804 座。

2．实用器普遍存在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的墓葬中，到了第三、四期，特别是第四期，实用器减少，明器则大量增加。另外，第四期时，墓中随葬大量的仿铜陶礼器，这些器物并没有多大的实用价值，而是专为墓葬中随葬用的，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3．在殷墟文化第三、四期时，出现了某些新器皿，如盘、壶、盂、瓿等。盘始见于第二期，至第三、四期时有所增加。罍、瓿亦多见于第三期，到第四期则大量增多。第三期中罕见的卣、鼎、斝、甗、甑、盂等器，在第四期时开始出现。

4．殷墟早期，墓葬中随葬的陶器大多是一类器物一件，但到殷墟文化第四期时，除觚、爵是各一件为一套外，其它陶器有随葬多件的现象，象罍、瓿、壶、罐等多 2 件以上，有些则多达十几件。觚、爵等一些酒器大多为象征性的明器而非实用器，而在早中商时期，这些器物多为日常实用器。这表明，实用器应是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明器可能是专为墓葬中随葬用的。

5．不同区域同一时期的墓葬，表现在陶器皿组合上是有所区别的。各地点的第二期墓，在陶器皿的组合上似乎没有多大差异。如苗圃北地以觚、爵、鬲或加豆及单一鬲，单一豆为多见，而大司空村亦多见单一鬲，小屯西地与白家坟西均见单一豆。从第三期起，区别逐渐明显，如苗圃北地以觚、爵、鬲或单一鬲为主；白家坟西以觚、爵、豆或单一豆为主；小屯西地与大司空村大致接近，以出觚、爵、盘、鬲（或加罍、或加豆、瓿或加豆、罐）；觚、爵、罍、豆（或加鬲）等多件陶器，但亦有用一豆或一鬲的。第四期，苗圃北地仍以觚、爵、鬲或单一鬲为主；白家坟西以觚、爵、盘为主；小屯西地及大司空村以觚、爵、盘、鬲、簋（或加罐、或加罍、或加觯）多件陶器为多见。郭家庄墓地第四期时，陶豆基本上没有或消失。

当然，这些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如白家坟西和孝民屯的第三期墓中均出觚、爵、簋；白家坟西的第三期墓也出单一鬲；小屯西地的第三期墓中也见觚、爵、

豆或觚、爵、鬲；大司空村第四期墓中也出觚、爵、鬲等等。各地点之间陶器组合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同地区同一时期的墓葬陶器组合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时期间的墓葬陶器组合亦存在着相当的差别。这些区别可能反映了殷族内部各支族埋葬习俗的不同。

（二）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家族特征

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家族特征表现在各类墓葬多成群集中分布，即有多个墓区。根据墓葬埋葬习俗、随葬器物以及青铜器铭文上的族徽不同，学者们认为："具有一个特定范围的墓地，保持着特定的生活习俗和埋葬习俗的各个墓区的死者，生前应属不同集团的成员。这个不同集团的组织形式可暂称为'族'。……不同墓区就是不同'族'的墓地。"[1]。笔者同意这一观点。这正说明了，殷代社会组织是以族为单位的，每一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合族而葬，因而形成了殷墟各墓地的"族墓地"。

从这几年殷墟的发掘中，我们发现，殷墟族墓地的分布是随着殷墟范围的不断扩大而扩展。目前，殷墟发现的族墓地，主要分布在孝民屯以南和白家坟以西地带（殷墟西区），梅园庄东南，后冈及其附近，大司空村东南地，苗圃北地，小屯西北地，刘家庄南地，刘家庄北地，戚家庄南地，郭家庄，王裕口南等地。其中以殷墟西区发掘面积最大，目前，资料发表较完整的墓地只有殷墟西区和郭家庄这两地。

殷墟西区墓地，位于安阳小屯村以西，今安阳钢铁公司厂址范围内，包括白家坟西，北辛庄南，梅园庄及郝家店北，安阳发电厂西。考古工作者于 1969－1977 年发掘墓葬 939 座（见表四）。1977 年以后至 1985 年，又发掘墓葬总数约有 868 座，但资料还未全部公布。发掘者根据墓葬集中分布的特点，将殷墟西区 1977 年以前发掘的墓葬分为 8 个不同的墓区，每个墓区就是一个不同"族"的墓地[2]。1977 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又在殷墟西区发掘了一批墓葬，于是将原来的 8 区增加到 10 区[3]，这十个区即为十个不同的族墓地（见图二）。

---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116 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 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 年 1 期，117 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121 页。

族墓地的规模，一般都在数十座或数百座以上。研究表明，族墓地内部通常还可分为不同的墓组。即同一族墓地中的某些墓葬聚族成更少的墓葬群，数座、十数座或数十座不等，自成一体。殷墟西区的十个族墓地中都包含有这样的墓组，如西区第三区东部的墓葬，明显可分为 12 个墓组[1]。后冈已发掘的 107 座商墓分为 3 个区，这 3 个墓区又可分为 8 组[2]。郭家庄已发掘的 194 座墓葬分为 3 个区，这 3 区又可分为 19 组[3]。通过对各墓组的分析，发现各组墓葬不仅相对集中，随葬品组合也各有特色。

殷墟西区第三区所分 12 个墓组中的第 9 组即为一处较为典型的家族墓群。对这一墓组作了统计发现，该组墓葬共计 28 座。其中有 25 座墓葬保存了较为完整的随葬品。依据随葬品的陶器形制，发现这 25 座墓葬中，属殷墟文化第二期早段的有 5 座，晚段的有 3 座；殷墟文化第三期的有 5 座；殷墟文化第四期早段的有 5 座、晚段有 7 座。显然四期墓多于二期和三期墓，这反映了家族规模的不断扩大[4]。

依据西区墓地所分的八个墓区，将各区墓葬陶器组合归纳如下（见表五）：

第一区：第二、三期有觚爵的墓的组合是觚爵豆鬲；觚爵豆簋；觚爵簋。无觚爵的墓的组合是单鬲；单簋或豆鬲簋。第四期的组合是觚爵盘；觚爵盘罐或觚爵盘罐簋。无觚爵的墓是单盘；单簋或盘或簋与其它器物的组合。这一期很少有鬲。

第二区：第二、三期以觚爵簋为主。无觚爵的墓为单豆；单鬲或豆鬲簋。第四期为觚爵盘簋或觚爵盘罐簋，多数墓的随葬品均以觚爵相伴。

第三区：第二、三期以觚爵；觚爵豆和觚爵簋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单鬲；单豆；单簋。第四期以觚爵盘；觚爵鬲；觚爵盘罐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大量的单鬲和单盘，另有一部分是鬲或盘加罐或簋或豆的。这一墓区出鬲相当多，有 75 座墓出有陶鬲。

第四区：前二期墓少。第四期以觚爵盘鬲；觚爵盘鬲簋为主，无觚爵的墓以盘为主，再配以簋或鬲或罐。

---

[1] 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2] 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4] 唐际根：《殷墟家族墓地初探》，《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 页。

第六区：第二、三期以觚爵豆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单鬲或单豆。第四期为觚爵；觚爵盘或单觚，单爵与其它器物的组合，无觚爵的墓多出单鬲，或鬲与其它器物的组合。

第七区：第二、三期以觚爵豆为主。无觚爵的墓出单簋；单豆或豆簋组合。第四期以觚爵盘或觚爵盘鬲为主，不出觚爵的墓以单盘；单鬲或单簋为多。

第八区：前二期墓较少，但都是出觚爵的墓。第四期以觚爵盘；觚爵盘罐为主。无觚爵的墓出盘簋与其它器物的组合。这一区共55座墓，只有一座墓出有陶鬲。这一点和第三区有着明显的区别，反映了不同族之间生活习俗和埋葬习俗的差异。

以上八个墓区代表了八个不同的族墓地，各区墓葬陶器组合的不同，说明西区墓地各个族之间的区别。另外，整个西区墓地器物群组合与大司空村墓地的器物组合大体相同。但也有一些区别，礼器中觚、爵、豆、盘的分布，早期以觚、爵、豆为主，晚期以觚、爵、盘为主。个别组群也存在无或较少觚、爵，而以豆或鬲（早）、盘或鬲（晚）为主。相反，有个别组群无或较少豆、盘，以觚、爵为主。在礼器组合中，簋在大司空村是常见的较稳定的器物，但在后冈墓地和西区墓地，簋却是一种占比重较小、分布又不均衡的器物。从整个殷墟西区墓地看，罐、鬲两器存在对立的倾向，即两者全无、有此无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分早、晚两段分析，则无论是早期的有鬲无罐，或晚期的有罐无鬲，可能均与此两类器物是否被人们使用无关。因为从墓葬方面说，早期罐的发现数量虽然较少，但确已存在；而到晚期，此两种器物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也许是当地的人们普遍随葬的缘故。因此，在各墓葬组群的陶器组合中，无罐或无鬲的情况，其原因可能反映了各组群在生活习俗上存在着一定差异，而不是这些墓葬组群所代表的社会团体不制造或不使用此两类器物。

墓葬采用何种随葬品组合方式，与墓地属性有关。不同的家族墓地，其随葬品组合方式往往有差异，这种随葬品组合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陶器上。关于后冈的三个墓区即三处“族墓地”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第一墓区是较大的宗族墓地，第二、三墓区是两个独立的家族墓地[1]。在陶器组合方面，一区墓葬较多以

[1] A．刘一曼、徐广德：《论安阳后冈殷墓》，《中国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87页。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37页。

鬲随葬，次为豆，觚、爵、罐很少；二区较多用觚、爵、罐的组合，豆、簋较少；三区则以觚、爵的组合为主，次为豆、盘，未见鬲、罐。即便是同一家族墓地，也会表现出家族间在政治地位、财富多寡等方面的差异。

有学者根据墓葬分布的区域以及器物组合的异同，将整个殷墟墓地分为三个大墓区：东区（大司空村南地），西区（小屯以西），南区（后冈南地）。同时又对各墓地以及各墓区内各个墓葬组群进行了分析研究[1]。另有学者专门对殷墟西区墓地进行研究，将原来所分的8个墓区细分为24个“分区”，分区之下划分出“墓组”，共有40个，墓组之下又划分出“墓群”，共有100多个。墓区代表“族”，墓组代表“分族”，墓群代表“家族”。同时各族之间在葬俗上存在较大区别，尤其在陶器组合及铜器铭文方面的区别最为明显[2]。因为陶器最常见，大小墓一般都有陶器随葬，陶器变化又最快，故陶器组合的不同可能反映出人们共同体之间文化传统与生活习惯的差别。

不仅考古发现证实了殷墟族墓地的存在，而且文献中也记载，殷人是有族的各级组织的。《左传》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肖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醜……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殷墟的族墓地，恰是殷人生时聚族而居，死后合族而葬的反映。这种埋葬方式不仅是殷人血缘关系及亲族组织的反映，也是社会经济及等级制度的反映。随葬品的种类和多寡反映了墓主生前的身份、等级及财富的占有状况。

（三）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殷代社会

首先，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所反映的殷代社会，其表现之一是仿铜陶礼器的组合。殷商晚期，墓葬中出现了明器化的铜礼器、铅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代替铜礼器的现象。仿铜陶礼器即是以陶质代替同时期的青铜礼器而制造出的器物。

仿铜陶礼器在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中大量出现，其器类有觚、爵、鼎、簋、斝、尊、甗、觯、卣、罍和盉等。本文第三部分的第七小节已对此类器物的出土地和组合情况作了阐述。在此，笔者对这一组合类器物出现的原因作一分析。大量仿铜陶礼器组合的出现，是殷墟文化第四期墓葬的新特点，也是殷墟墓葬埋葬习俗的一个新特点，反映了殷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

---

[1] 葛英会：《殷墟墓地的区与组》，《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153页。
[2] 韩建业：《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1期，66页。

对于这些仿铜陶礼器出现的原因，过去有学者作过研究。有研究者认为，殷墟文化第四期大量出现仿铜陶礼器的现象，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殷纣亡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并进而认为，武王灭商以后，殷墟铸铜作坊一类的工业迁到了洛阳。因此，殷人（遗民）上层贵族死后只能以仿铜陶器随葬[1]。这一看法很有新意，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尚需更多的发掘资料去证实。

仿铜陶礼器不同于一般的日用陶器。有学者指出，仿铜陶器和铜器的组合在反映当时社会礼制方面的作用是相同的，它们之间的差别仅是形式的不同。它们在反映墓主身份地位时的表象作用是一致的。仿铜陶礼器之所以和一般的陶器不同，是因为商人赋于它深刻的社会意义[2]。

另有学者在论述殷代后期随葬器物明器化的原因时，曾提到《史记·殷本纪》中“武乙射天”的故事，他们认为这个故事反映了殷代后期殷人对上帝和神的信仰已开始动摇[3]。这说明在当时存在着对天、对鬼神怀疑的思想。笔者认为，把殷墟仿铜陶礼器墓出现的原因归结于商人对天、对鬼神怀疑的思想，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更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商人“敬天”、“法祖”观念的动摇，这可从以下文献中找到合理的解释。

《史记·殷本纪》载：帝纣纵情享乐，“慢于鬼神”。《尚书·牧誓》谓：“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从文献记载中可知，这种制作简单，节约原料，多少只是一把泥的仿铜陶礼器，正是在商代“敬天”、“法祖”观念已经产生动摇的社会意识下出现的。

古人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奴隶社会里，祭祀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表达了一种对上天、先祖的敬畏思想，而商纣“弃厥肆祀”，足见晚商时期这一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发生了动摇。礼器作为祭祀的一种形式和载体，其明器化的过程不仅表明礼制的没落，而且说明商人长期以来对鬼神先祖的敬畏思想动摇了，仿铜陶礼器墓的出现正是这一思想的反映。这种形式的墓葬多出现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此时正处于殷周交替之际，或可说正是西周“轻天重民”思想的渊源。

---

[1] 唐际根、江涛：《殷墟第四期文化年代辨微》，《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 2004年，41页。

[2] 岳洪彬、苗霞：《殷墟青铜礼器组合研究》，《殷都学刊》2004年2期，33页。

[3] A：杨锡璋、杨宝成：《殷代青铜礼器的分期与组合》，《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100页。
B：刘一曼：《安阳殷墓青铜礼器组合的几个问题》，《考古学报》1995年4期，405页。

殷商晚期出现的仿铜陶礼器墓，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是人们对资源利用思想的转变。

由于敬畏鬼神思想的动摇以及商人固有礼制的没落，人们对资源利用的观念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商人逐渐意识到将大量青铜器埋入墓中是一种浪费现象，而将其用之于现实生活则更为实际。从当时的铸铜遗址情况分析，当时并非不能铸造精美的青铜礼器，而是商人认为已没有随葬大量精美青铜礼器的必要。因此，用陶质代替青铜做成同型式的器物即仿铜陶器就这样大量出现了。

其次，殷墟墓葬陶器组合反映了殷人的饮酒风俗。这一饮酒风习在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殷墟的大中小型墓葬里，大多随葬有一至多套陶酒器。如盛酒的方彝、尊、觥、卣、罍等，温酒用的爵，饮酒用的觚等，都大量出土。商代墓葬中作为礼器基本组合的酒器是觚和爵；贵族以青铜质，平民则以陶质，虽然质料不同，但用意却是相同的，都是祀神用的酒器。商人嗜酒的风气，墓葬内出土的遗物便是明证。笔者统计，含有陶酒器组合的墓葬在各期中的分布情况是：第一期 8 座，第二期 30 座，第三期 123 座，第四期 253 座，共有 904 座墓葬，占本文已统计墓葬总数的近一半。这一方面说明了商代后期酿酒业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殷人嗜酒的风习。

古文献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很多。《说文・卷十四》酒字：“古者仪狄作酒醪，禹赏之而美，遂疏仪狄。”《尚书・酒诰》说：“惟荒腼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这可能是周人给商定的重大罪状。商的贵族微子也承认他们喝酒过量，致使国家丧乱。他说：“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尚书・微子》）“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周书・无逸》）

周初的金文中也有同样的文辞：“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大盂鼎铭》）周人所作的诗歌中也有记载：“咨汝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诗经・大雅・荡》)

甲骨文中关于酒的记载频繁，酒器的发现很多，作为祭神用的酒类名称就有酒、醴、鬯等，且用量多，次数也多。祭祀用酒的分量，据王国维考察说：“殷

虚卜辞祭祀所用之，自六卣以至于百。”[1]

乙卯贞，酌大乙……。（《粹》133）

贞王于魯酌于上甲。（《掇》298）

癸酉卜，争贞：来甲申，酌大，大报自上甲。五月。（《甲骨文零拾》第21片）

贞昱乙酉，酌唐足。（《遗》4）

昱丁亥，酌大丁。（《乙》4510）

癸卯卜，㱿，昱甲辰酌大甲。（《乙》7258）

还有一种酒叫醴（《粹》232），据说是一种甘酒。说明商代后期酒的品种复杂，祭祀用酒量和饮用酒量之大。另外，从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铜器观察，发现大多数器物是酒器。墓葬中出土的陶酒器也相当多，如觚、爵、斝、盉、觯、卣等，都是饮酒用的。可见殷人饮酒之风相当严重。

甲骨文第一至五期卜辞都有酉字，作 ＜京 749＞、 ＜京 3966＞，象酒尊之形；后有酒字作＜甲 2121＞、作 ＜人 1932＞，与篆文酒字同。由殷墟发现的爵、斝等字形和出土实物，以至于卜辞中众多薦酒之祭的实录，加上《尚书·酒诰》、《殷本纪》中的“以酒为池”等记载，可见殷人喝酒是十分普遍的活动。

甲骨文中有武丁时期以酒祭神的记载，如武丁时卜辞记他一次就曾用一百卣的鬯酒为祭：

贞昔乙酉葡旋御（于大）丁、大甲、祖乙百鬯百羌三百（牢）。（《合集》301）

贞王侑百鬯、百牛。（《合集》32044）

胡厚宣先生对殷代人殉和人祭的研究中，曾列出了殷人祭祀祖丁配偶妣庚的几条卜辞，每条卜辞用鬯都是三十卣。

乙丑卜，酒御于妣庚，伐廿，鬯卅。（前 1．35．5）

戊寅卜。贞三卜，用血三羊，鬯卅，牢卅，卩二肉于妣庚。（前 8．12．6）[2]

甲骨文中有关各种祭祀的活动中，酒是一种不可或缺的神圣之物。同时，

[1]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一，《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958年。
[2]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8期，57页。

殷人的宗教祭祀也与酒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殷人嗜酒的习俗有深刻的宗教意义[1]。

殷人对酒的嗜好，不仅在文献和甲骨文中有记载，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为考古发掘的资料所证实。1976年发掘的殷墟妇好墓[2]，其随葬器物有1928件，青铜器达460多件，其中青铜礼器有210件，这210件礼器中，酒器有155件，占整个礼器总数的73.8%。同时也出有陶酒器爵等。郭家庄M160是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3]。墓中随葬品有350多件，青铜礼器有40件，其中青铜酒器觚、角、觶等有31件，占整个礼器总数的75%，另有陶酒器觚、爵、罍12件。

不仅大中型墓随葬有酒器，小型墓甚至是平民墓也普遍随葬酒器，这表明中下层平民同样有嗜酒的习俗。据1969－1977年安阳殷墟西区墓地发掘资料，平民墓中最常见的随葬品，为陶制的酒器觚、爵[4]。据笔者统计，在总数939座墓葬中，随葬陶觚、爵等酒器的墓有508座，随葬铜或铅觚、爵的墓有67座，两者共占墓葬总数的61.3%。其中第八墓区有55座墓，有49座出陶觚、爵，占该区墓葬总数的89%以上。礼器的组合，前期主要为觚、爵配食器豆、鬲或簋；后期主要为觚、爵配盘、鬲、罐之类，不出觚、爵的墓极少，仿铜陶礼器也出现于这一时期。西区墓葬多为中下层平民墓葬，这些墓葬随葬的酒器之多，表明平民阶层饮酒风习之重。由此可见，殷人上到贵族阶层下到平民百姓甚至贫苦农民对酒的兴趣之浓。

第三，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反映出的阶级关系亦十分明显。在同一墓地中，不仅有贵族墓而且也有平民墓。贵族墓有不同的等级，平民墓也有贫富和地位高低的不同。平民墓中随葬陶器的多少也能反映出阶级关系的差别。有的小型土坑墓随葬较多的陶器，同时还伴出玉饰和一些铜器，这类墓的墓主，应当是比较富裕和有一定地位的平民。有些墓随葬陶器少，或无随葬品，这类墓的墓主应当是比较贫穷的平民或奴隶。至于那些没有任何随葬品的死者，则无疑是奴隶。这些区别虽然不像随葬铜器的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关系明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不同阶级内部的一些细微差别。下面从对殷墟西区和郭家庄两墓地分别说明

[1] 张锥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3期，第23页。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70页。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之。

殷墟西区墓地共分为八个区，其中第三区有墓葬369座，是整个西区中保存墓葬最多的一区。其中有四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型墓葬[1]，分别是M698、M699、M700、M701。这四座墓的墓室面积均在14平方米以上，有大型棺、椁为葬具，有丰富的随葬品。其中有三座墓均殉葬2－12人，另一座墓墓道中发现有一车马坑。由于这四座墓均被盗，随葬品不全，残存的陶器有觚、爵、盘、罐、簋、硬陶罐、白瓷罐等。除了带墓道的墓葬以外，还有一些墓葬的墓室面积多在3－10平方米，其中有些墓有棺，出铜器及带殉人的墓较少。还有一些墓葬的墓室面积更小，大多在2.5平方米以下，这类墓没有殉人，随葬品贫乏，多是一些陶器。

郭家庄墓地分北、中、南三区[2]。北区墓葬规模较大，墓葬的墓室面积多在3－8平方米之间，随葬品较丰富。有椁室、有殉人的墓也较多。M160即在这一区。中区墓葬大都略小于北区，面积最大的有6平方米，出铜器的墓不多。南区墓葬面积更小，大多在2.5平方米以下，没有一座墓有椁室，也没有一座墓有殉人。随葬品更为贫乏[3]。

由此推测，那些带墓道或随葬品丰富的墓葬，其墓主生前可能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享有很高的礼遇。而那些规模相对小或随葬品贫乏的墓葬，其墓主生前政治地位和礼遇极低。这些情况表明，晚商墓葬所反映的阶级关系非常明显。事实上，殷墟各个族墓地均存在这种阶级差别，只是有些族墓地表现得不是特别明显，而有些则清楚地反映了这一阶级关系。

商代社会的等级制度，还强烈地反映在不同的族墓地之间。普通的殷墟族墓地，只有为数不多大中型墓葬存在，这些墓葬规格相对较高，随葬品较丰富。有些族墓地甚至没有大中型的墓葬，都是小型墓葬，其随葬品显然不如大中型墓葬丰富。这一等级差别在殷墟各个族墓地都有所体现。

埋葬制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殷墟墓葬则是商代奴隶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商代，埋葬制度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左传》隐公十一年）。礼乐制度是商代政治和宗教制度的核心，是贵族奴隶主区别等级名分处理内部关系的依据和准则。而礼器是服务于礼乐制度的，是“明贵贱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2页。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13页。

辨等级”的标志物，因此，孔子曰：“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

晚商墓葬中大多随葬礼器，不同类型的墓随葬礼器的种类和数量乃至规格有所不同。墓葬中随葬礼器说明墓主人生前有权自备礼器，有权参加一定范围内的政治性和宗教性的活动。从而在他死后亦有权享有相应级别“礼”的待遇。随葬礼器的种类和数量，则直接反映墓主人生前的政治地位和身份的高低。所以礼器是奴隶社会中“明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一种标志物。殷墟墓葬中随葬的礼器以青铜礼器数量最多，但也出一些陶礼器，尤其是觚、爵二器最为常见，这两种器物一般成对出现。在殷墟，陶觚、爵在绝大多数小型墓中出土，但大中型墓中也会随葬一套陶觚、爵。在商代早期陶觚、爵是实用的酒器，到殷墟时期则演变为明礼器，没有多大实用价值。尽管如此，礼器作为一种标志物，它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仍然是毋庸置疑的，墓葬中随葬礼器的多寡和有无同样是区分墓主身份和地位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六、结 语

殷墟墓葬中的陶器主要是指殷人日常生活用的陶容器。陶器应用广泛，数量众多，是殷墟时期最常见的文化遗物，在居住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大量发现。墓葬中随葬的陶器种类有觚、爵、豆、盘、簋、罐、盂、斝、觯、甑、尊、卣、壶、盆、甗等。另有一些明器化陶器和仿铜式陶器，如觚、爵、鼎、尊、卣、斝等。

不同的墓葬，其陶器组合有所不同，将这些组合按其用途不同分为七大类：酒器类；炊食器类；酒器与炊食器的配套；盛贮器类；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的配套；仿铜陶器类。以上七类组合，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每一期都呈递增的趋势，尤其在第四期，有将近一半的墓葬随葬这一类组合，其它类组合占比例较小。酒器中觚、爵二器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觚、爵组合已成定制。晚商时期是“重酒的组合”，殷人饮酒风俗的盛行不仅在文献、甲骨文中有记载，而且被考古发掘资料所证实。

对以上各期墓葬陶器组合的分析表明：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墓葬中陶器数量较少，器物种类单一，组合形式单一。到了第三、四期时，随葬陶器的数量随之增加，器物种类增多，组合形式多样。这一时期，出现了较多新器皿，如盘、壶、盂、瓿等。盘始见于第二期，至第三、四期时有所增加。殷墟文化第四期，

觚、爵、盘组合所占的比例较多，而觚、爵、豆的组合则较少。觚、爵与其它器物的搭配占相当大的比例，觚、爵组合已成定制。罍、瓿亦多见于第三期，到第四期则大量增多。第三期中罕见的鼎、斝、甗、甑、盂等器，第四期时多有出现。

殷墟时期，墓葬中随葬陶器组合具有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和早中商以及西周时期墓葬陶器组合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殷墟直至西周时期，墓葬中的陶器组合较为固定；早中商时期，陶器组合均未有较为固定的形式。第二，殷墟时期，墓葬陶器组合多为酒器和炊食器的配套，虽然食器鼎、簋有所增加，但酒器仍是组合的核心，这一时期仍是“重酒的组合”而非“重食的组合”；而早中商和西周时期，陶器组合多为炊食器而少酒器。第三，殷墟时期，觚、爵配套已成定制，且两类器物多出现在墓葬中，遗迹中少见；早中商时期，觚、爵同时出现的次数极少，且此两类器物都是在遗迹中发现，墓葬中不见。第四，殷墟时期，觚、爵等器并非实用器，是专为墓葬中死者而作的明器；早中商时期，这些器物都是实用器。

早中商、殷墟、西周时期陶器组合有着差异性和相似性。差异性说明三者不属于同一时期，而相似性说明它们之间年代较为接近，殷墟墓葬陶器组合是在吸收二里岗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对西周初年的陶器组合有着深远的影响，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殷人是有族的各级组织，每一族成员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合族而葬，因而形成不同的族墓地。有些族墓地又可分为不同的墓区，分区之下又分不同的墓组，另有在墓组下分为不同的墓群。随着研究的深入，墓群之下有再细分的可能。上述各地点墓葬陶器组合的差别，反映了殷墟各家族墓地的区别。不同的家族墓地，随葬品组合各有特点。即便是同一地区，不同时期间的墓葬陶器组合亦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这些区别反映了殷族内部各支族埋葬习俗的不同。

参 考 文 献

著作：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上、中、下篇），文物出版社，2001 年。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3 年。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上、下篇），文物出版社，2001 年。
[4] 石璋如：《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1948 年。
[5] 郭宝钧：《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第五册第一、二分合刊，1951 年。
[6] 马得志等：《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 年。
[7] 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 年。
[9] 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年。
[10] 郭家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1] 郑振香：《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 年。
[12]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13] 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4] 李民、张国硕：《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5]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16] 孟宪武：《安阳殷墟考古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初版；1985 年再版。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 年），文物出版社，1987 年。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 年。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2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4 年。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论文：

[1] 安金槐：《郑州市郊区及市区发现古代遗址及殷商墓葬》，《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 4 期。
[2] 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10 期。
[3] 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考古》1965 年 10 期。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文物》1983 年 3 期。
[5] 王彦民、赵清：《郑州二里岗发掘一座商代墓》，《中原文物》1982 年 4 期。
[6] 安金槐：《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华夏考古》1988 年 4 期。
[7] 洛阳博物馆：《洛阳庞家沟西周墓的清理》，《文物》1972 年 10 期。
[8] 杨锡璋：《殷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 年 10 期。
[9] 郑振香、陈志达：《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考古》1981 年 6 期。
[10] 唐际根：《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3 年 10 期。
[11] 邹衡：《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殷都学刊》1988 年 1 期。
[12] 杨宝成：《试论殷墟文化的年化分期》，《考古》2000 年 4 期。
[13] 杨宝成：《殷墟墓葬发掘与研究》，《殷都学刊》1984 年 2 期。
[14] 郑振香：《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考古》1988 年 10 期。
[1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8 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考古通

讯》1958年10期。
[1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考古学报》1958年3期。
[17]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5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1期。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一座殷墓》,《考古》1979年3期。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三家庄东发掘》,《考古》1983年2期。
[2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8期。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考古》1986年8期。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薛家庄东南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12期。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7年1期。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2期。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7期。
[3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考古》1991年2期。
[3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160号墓》,《考古》1991年5期。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6期。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10期。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4年4期。
[36] 安阳市博物馆：《殷墟戚家庄269号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3期。
[37]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3期。
[38] 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1期。
[39]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5年1期。
[40]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安阳郭家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考古》1991年10期。

地 点	墓 数	分 期				不能分期
		一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郭家庄	199	0	14	59	69	57
后冈	92	1	20	18	17	36
西区	940	0	74	189	435	242
梅园庄	115	0	2	25	40	48
小屯	54	0	4	15	5	30
苗圃	90	8	21	14	8	43
张家坟	4	0	0	0	1	3
王裕口西	15	0	1	0	1	13
白家坟	62	0	1	31	17	13
孝民屯	9	0	0	7	1	1
北辛庄	3	0	0	2	1	0
南区	56	2	10	8	20	14
大司空村	239	2	11	19	188	18
武官村	1	1	0	0	0	0
薛家庄	6	1	1	1	1	2
花园庄	4	0	0	2	2	10
总计	1900	15	159	390	806	530

殷墟各地点墓葬分期统计表（表一）

地点	墓号	面积	鼎	簋	斝	甗	罍	尊	觚	爵	盉	卣	觯	总数	资料出处	备注
西区	M216	4.2	1	1	1	1		1	2	2				9	《考古学报》1979年1期	被盗
西区	M4	3.32	1	1	1			1	2	2		1		9	《考古学报》1979年1期	
西区	M1057	4.8	1	1	1	1	1		2	2		1	1	11	《考古学报》1979年1期	
西区	M1133	3.8	1	1	1			1	2	2		1	1	10	《考古学报》1979年1期	
西区	M1134	2.76	1					1	1	1		1	1	6	《考古学报》1979年1期	
62大司空村	M53	4.27	1	1	1			1				1		5	《考古》1964年8期	另出铜觚2爵2觯1
八里庄	M52	2.52						1	1					2	《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另出铜爵1
梅园庄	M67	3.0	1	1				1						2	《考古》1991年2期	另出铜爵1
戚家庄东	M63	5.44											1	1	《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另出铜鼎2簋1斝1觚2爵2罍1觯1壶1
四盘磨	M6	2.8	1	1	1	1	1	1	1	1	1	1		10	《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五册，1951年	被盗
84苗圃	M129	2.7	1	1				1	1	1				5	《考古》1989年2期	
80苗圃	M15	4.0	1	1					1	1				4	《考古》1986年2期	
小屯西二区	M233	3.9	2	2	1			1		1		1		8	《殷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刘家庄南	M42	7.7	1							1	1			3	《中原文物》1986年3期	被盗
刘家庄南	M54	4.35	1											1	《中原文物》1986年3期	被盗
八里庄东	M14	3.96								1				1	《华夏考古》1995年1期	被盗

殷墟仿铜陶礼器墓统计表（表二）

器类 器物 期别	酒器类	炊食器类	酒器和炊食器	盛贮器类	炊食器和盛贮器	酒器、炊食器和盛贮器	仿铜陶器类
	觚爵斝罍觯等	豆盘簋鬲甗甑等	觚爵豆尊盂罐等	瓿壶盆鼎瓮等	鬲盘盆罐　等	觚爵豆盘鬲瓿尊斝卣等	觚爵鼎簋斝等
第一期	1	5	7	1	1	0	0
第二期	10	60	84	1	0	3	0
第三期	50	128	200	2	3	3	0
第四期	74	157	531	5	13	24	16
总数	135	350	822	9	17	30	16

殷墟墓葬陶器组合分类统计表（表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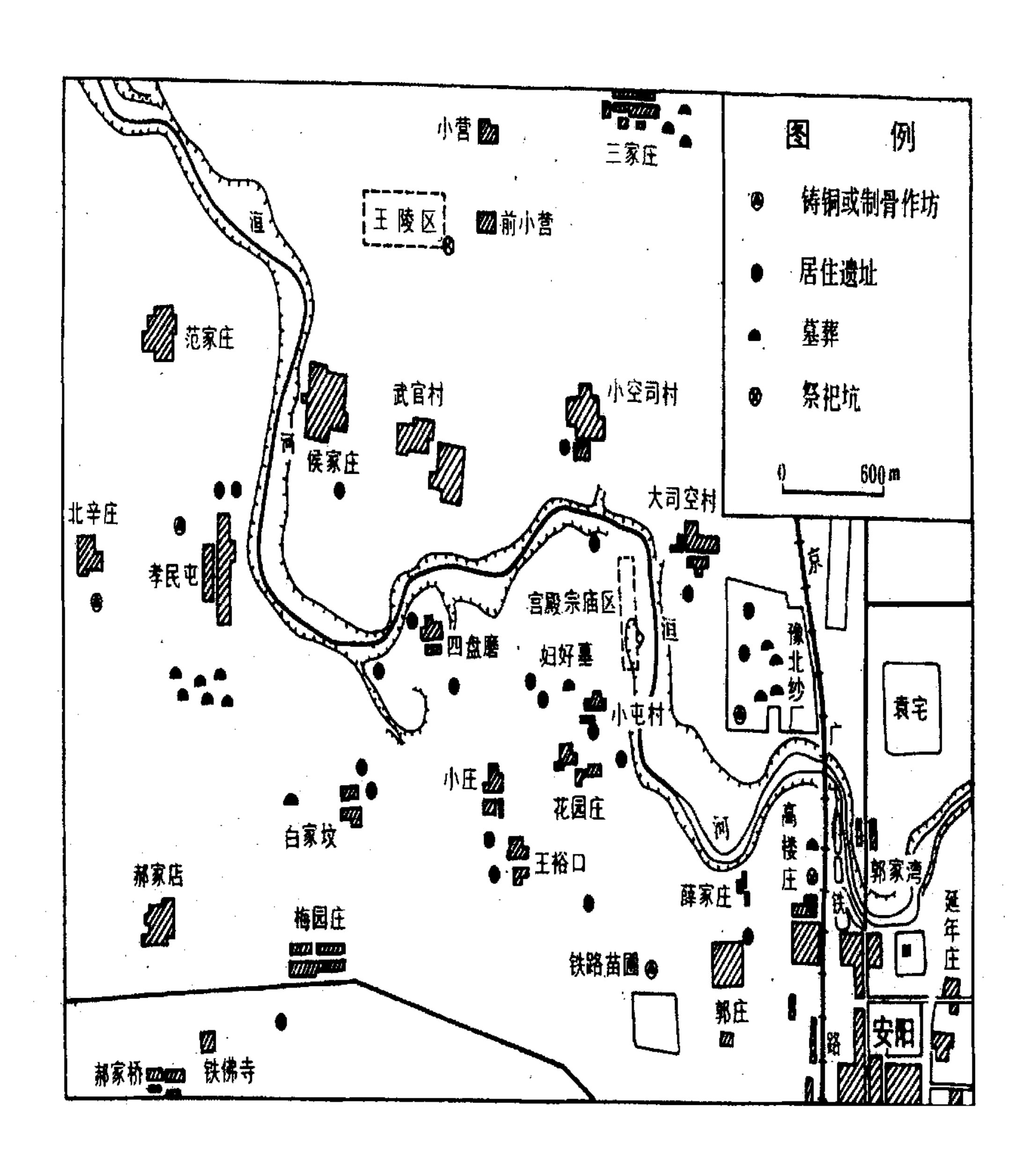
（注：酒器和炊食器类组合是指任何一种酒器或炊食器相互之间的组合，其它如此。）

墓区	墓数	分期			不能分期
		二期	三期	四期	
一	144	13	31	61	39
二	55	13	16	16	10
三	369	36	78	148	107
四	60	3	5	40	12
五	6	0	2	4	0
六	145	4	21	81	39
七	105	4	31	39	31
八	55	1	5	45	4
总计	939	74	189	434	242

殷墟西区墓葬分期统计表（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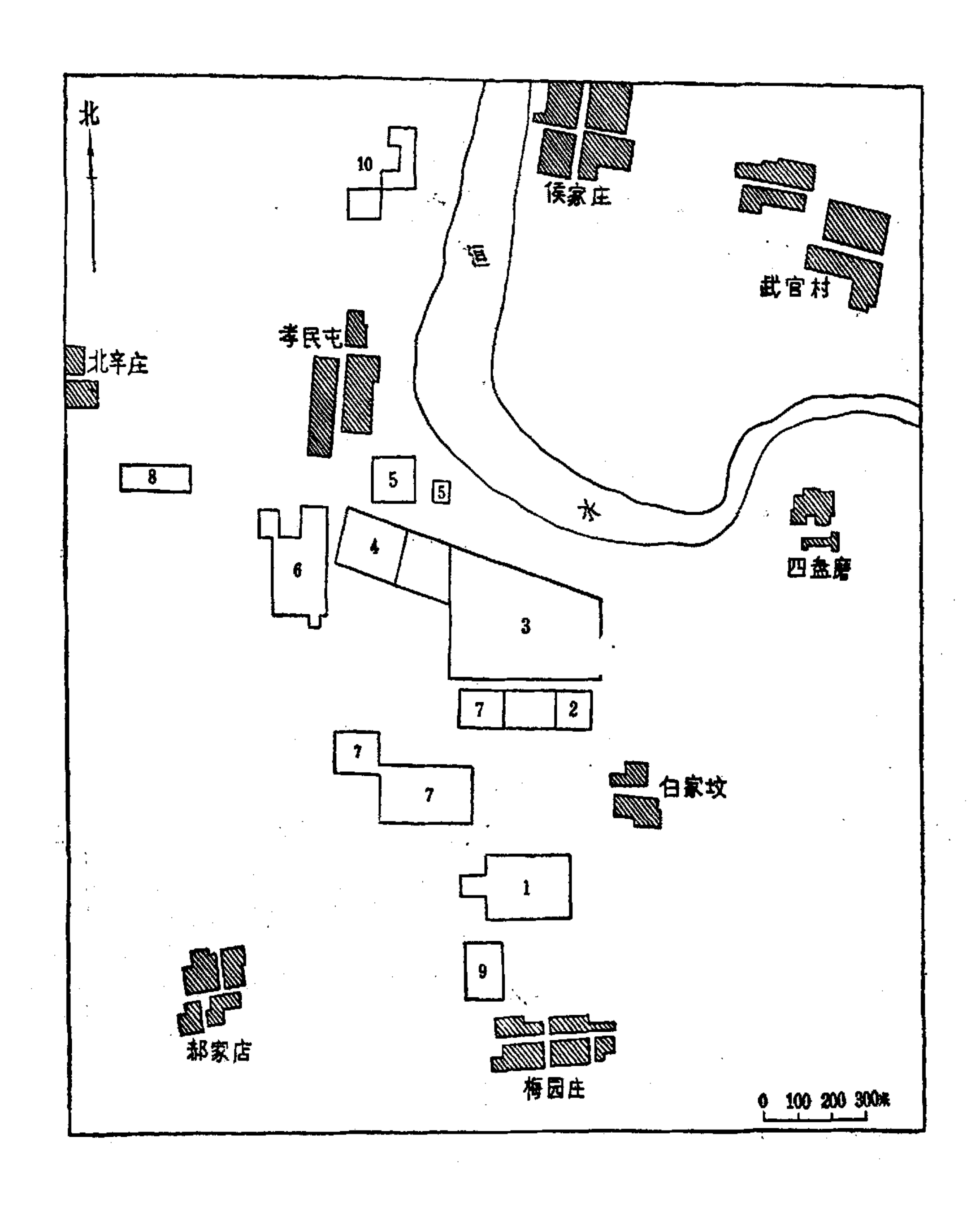
墓　区	分期	陶器组合
第一区	二期	觚爵豆鬲；觚爵豆簋
	三期	觚爵豆鬲簋
	四期	簋；觚爵盘；觚爵盘罐
第二区	二期	豆；鬲
	三期	豆鬲；觚爵簋
	四期	觚爵盘簋；觚爵盘
第三区	二期	觚爵豆；觚爵盘；鬲；觚爵簋
	三期	鬲；簋；豆；觚爵；觚爵豆；觚爵簋
	四期	鬲；觚爵盘；觚爵鬲；觚爵盘罐；觚爵盘鬲罐
第四区	二期	觚爵；觚爵豆
	三期	簋；觚爵豆鬲
	四期	觚爵盘鬲；觚爵盘罐；觚爵盘罐罍
第五区	二期	无陶器
	三期	觚爵豆鬲；爵
	四期	觚爵豆鬲
第六区	二期	豆；觚爵豆
	三期	豆；觚爵；觚爵鬲
	四期	觚盘；觚爵；盘簋；觚爵鬲；觚爵盘；觚爵盘罐；觚爵盘簋；觚爵盘罍
第七区	二期	觚爵豆
	三期	鬲；簋；觚爵；觚爵豆
	四期	鬲；觚爵盘；盘鬲罍；觚爵豆盘
第八区	二期	觚爵簋罐
	三期	觚爵豆；觚爵
	四期	觚爵盘罐；觚爵盘

殷墟西区各墓区墓葬陶器组合统计表（表五）



图一　殷墟遗址墓葬分布图

（采自《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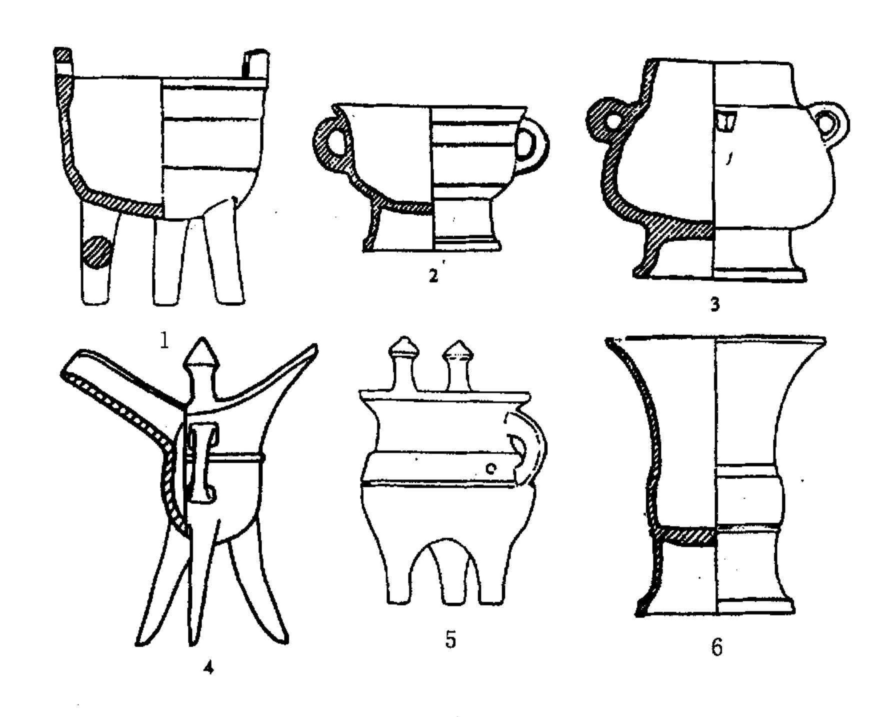
图二　殷墟西区墓葬发掘区位置图

（1－10.墓区编号，采自《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器物 分期	觚	爵	鬲	豆	盘	簋
一期	苗圃北地M58	苗圃北地 M58	苗圃北地 M22	苗圃北地 M248		武官 M1
二期	苗圃北地M17	苗圃北地 M17	苗圃北地 M17	苗圃北地 M17		花园庄东 M54
三期	苗圃北地 M142	苗圃北地 M70	苗圃北地 M70	苗圃北地 M175	殷墟西区 M499	殷墟西区 M477
四期	苗圃北地 M105	苗圃北地 M1713	苗圃北地 M105		苗圃北地 M1713	殷墟西区 M3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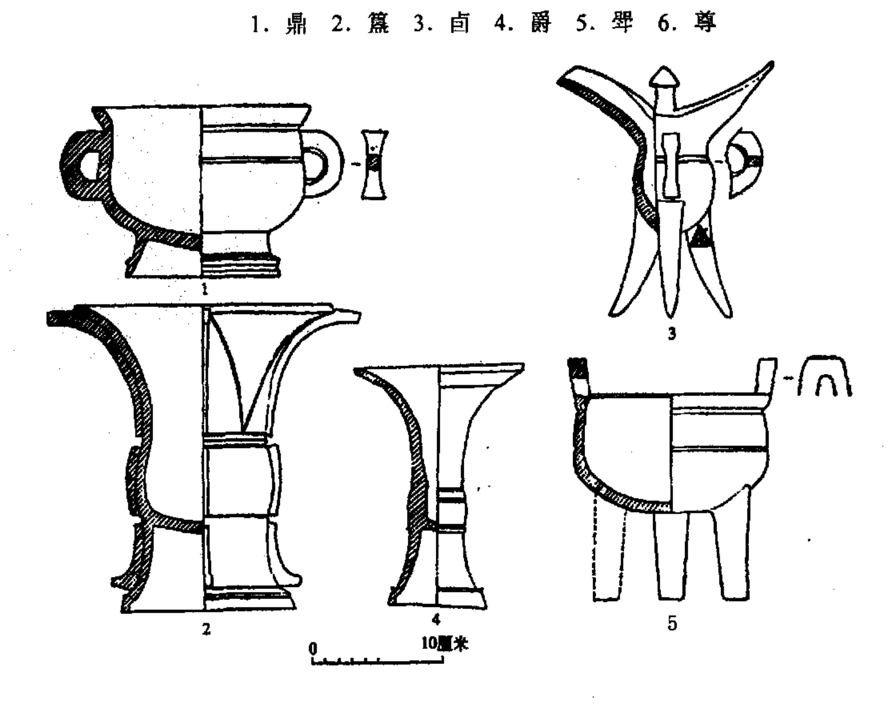
图三　殷墟墓葬陶器分期图

（采自《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和《考古学集刊》15 集）



图四　小屯西地殷墟四期晚段墓葬 M233 出土的仿铜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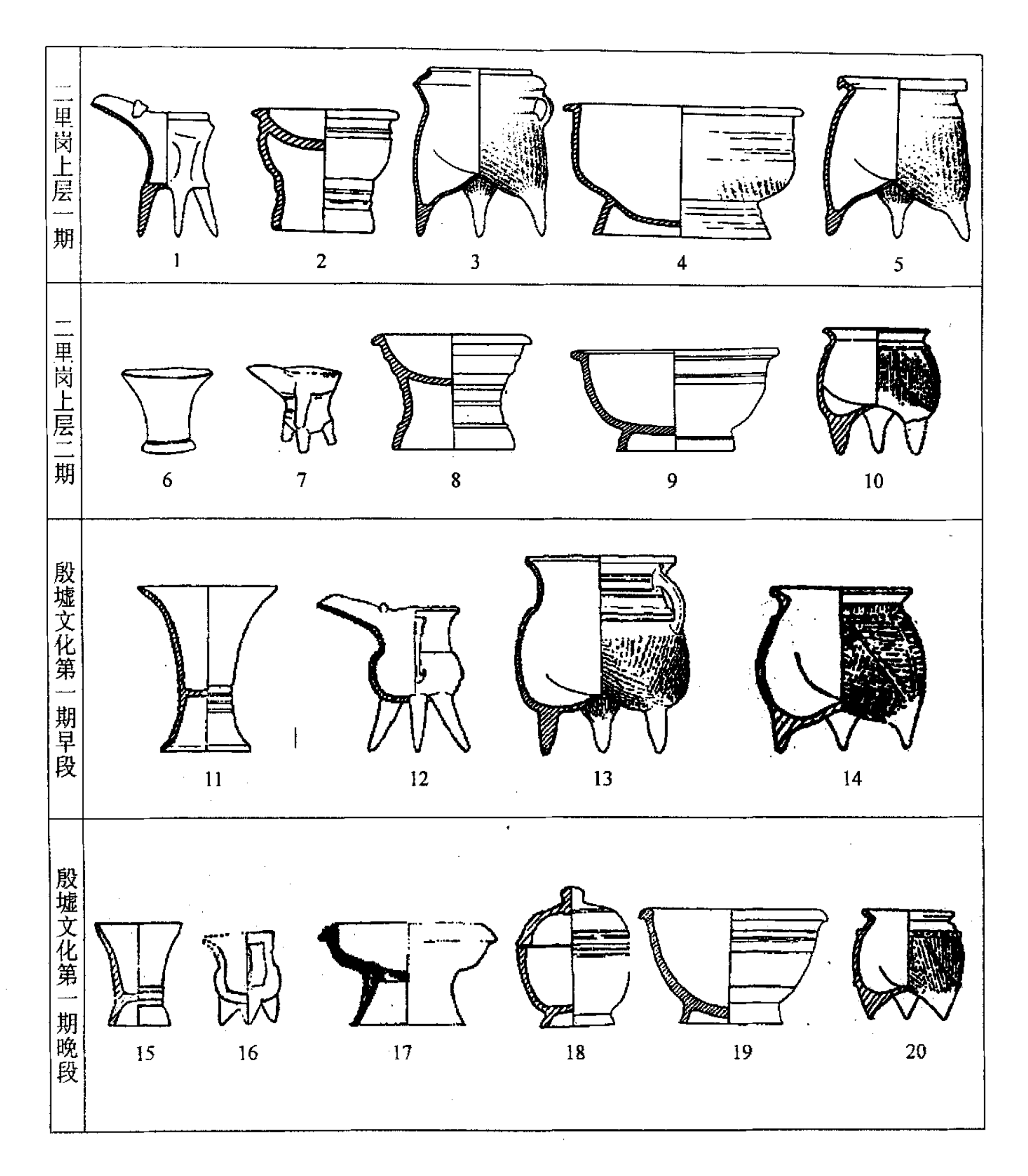
1. 鼎　2. 簋　3. 卣　4. 爵　5. 斝　6. 尊



图五　苗圃北地殷墟四期墓葬 84M129 出土的仿铜陶器

1. 簋　2. 尊　3. 爵　4. 觚　5.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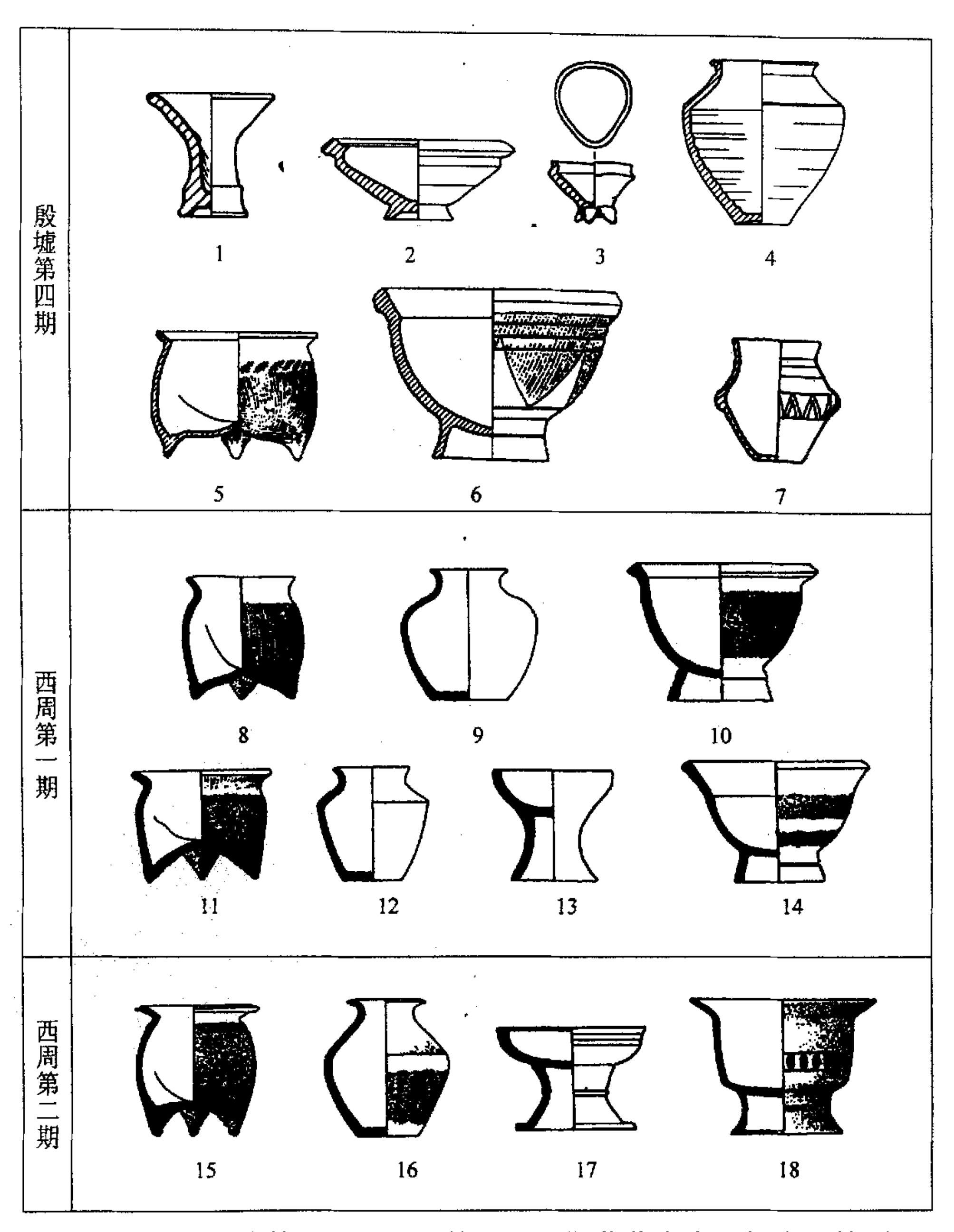
（图四和图五均采自《考古学集刊》15 集）



图六　二里岗上层、殷墟第一期墓葬内陶器组合比较图

(采自《考古》1989年2期和1983年2期)

1. 爵（M5） 2. 豆（M5） 3. 斝（M5） 4. 簋（M5） 5. 鬲（M5） 6. 觚（琉璃阁M203） 7. 爵（琉璃阁M233） 8. 豆（白家庄M5） 9. 簋（白家庄M5） 10. 鬲（琉璃阁M245） 11. 觚（三家庄M4） 12. 爵（三家庄M4） 13. 斝（三家庄M4） 14. 鬲（苗圃北地M98） 15. 觚（苗圃北地M118） 16. 爵（苗圃北地M118） 17. 豆（小屯M14） 18. 盂（59武官M1） 19. 簋（59武官M1） 20. 鬲（苗圃北地M118）



图七　殷墟文化第四期、西周第一、二期墓葬内陶器组合比较图

（采自《考古》2004年1期）

1. 觚（刘家庄北M64）　2. 盘（刘家庄北M64）　3. 爵（刘家庄北M64）　4. 罐（刘家庄北M64）　5. 鬲（西区M129）　6. 簋（小屯M4）　7. 罍（西区M429）　8. 鬲（长安张家坡M178）　9. 罐（长安张家坡M178）　10. 簋（长安张家坡M178）　11. 鬲（客省庄M145）　12. 罐（客省庄M145）　13. 豆（客省庄M145）　14. 簋（客省庄M145）　15. 鬲（客省庄M69）　16. 罐（客省庄M69）　17. 豆（客省庄M69）　18. 簋（客省庄M69）

后 记

时光匆匆，三年的学习生涯即将结束。短暂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求学生涯留下最难忘的回忆。走向而立之年的我，不免对人生和求学有了一些感悟，“付出总会有所回报，而竞争是促使你上进的动力，没有了动力，人就会永远停滞不前”。

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间，导师张国硕教授给予我太多的帮助。生活上，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学习上，得到他耐心的指教和帮助；尤其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不辞辛劳，亲手帮我修改文章，从论文的开题、大纲的修改直至字斟句酌到最后成稿，都得到老师的悉心指导。在此谨向老师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在论文资料搜集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一曼先生、杨锡璋先生、唐际根先生、岳洪彬先生等的热情帮助和指导，并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这使本文更加充实完善。另外，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靳松安老师等，安阳师范学院历史系李雪山老师、郭旭东老师等对论文也提出一些建议，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感谢。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爱人何毓灵作为这篇论文的第一位读者，自始自终关注论文的写作，并提出修改意见。三年来，他在经济上支持我，生活上关心我，不管我遇到多大的困难，他总会在背后鼓励和支持我。在此向他以及我们的家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文的英文摘要部分是在好友王惠苑的帮助下完成的。我的同室密友张雪芬、徐蕊、张亚娜以及同学庞小霞、朱光华、杨远、赵海洲等，她们在学习上的帮助，生活上的照顾和关心，使我非常愉快地度过了三年难忘时光。在即将毕业之际，特向她们道声：谢谢！

胡洪琼

2005年5月15日

殷墟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研究



作者： 胡洪琼
学位授予单位： 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64条)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 2001

2.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文物考古与研究 2003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盘龙城 2001

4. 石璋如 河南安阳后冈的殷墓 1948

5. 郭宝钧 一九五〇年春殷墟发掘报告 1951

6. 马得志 一九五三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 1955

7. 宋镇豪 夏商社会生活史 1996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沣西发掘报告 1962

9. 范祥雍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57

10. 郭家钧 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 1981

11. 郑振香 论殷墟文化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1986

12.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1998

13. 张国硕 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 2001

14. 李民.张国硕 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 1998

15. 杨宝成 殷墟文化研究 2002

16. 孟宪武 安阳殷墟考古研究 2003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妇好墓 1980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年) 1987

1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发现与研究 1994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青铜器 1985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 1998

2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查看详情 1998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 三代考古 2004

2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 2003

25. 安金槐 郑州市郊区及市区发现古代遗址及殷商墓葬 1954(04)

26. 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一队 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 1955(10)

27. 郑州市博物馆 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 1965(10)

2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郑州北二七路新发现三座商墓 1983(03)

29. 王彦民.赵清 郑州二里岗发掘一座商代墓 1982(04)

30. 安金槐 关于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陶器分期问题的再探讨 1988(04)

31. 洛阳博物馆 洛阳庞家沟西周墓的清理 1972(10)

32. 杨锡璋 殷代的墓地制度 1983(10)

33. 郑振香.陈志达 论妇好墓对殷墟文化和卜辞断代的意义 1981(06)

34. 唐际根 殷墟一期文化及其相关问题 1993(10)

35. 邹衡 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 1988(01)

36. 杨宝成 试论殷墟文化的年化分期 2000(04)

37. 杨宝成 殷墟墓葬发掘与研究 1984(02)

38. 郑振香 殷墟发掘六十年概述 1988(10)

3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1958年春河南安阳市大司空村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1958(10)

40.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 一九五五年秋安阳小屯殷墟的发掘 1958(03)

41.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 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 1961(02)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 1972(03)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2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 1972(05)

4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简报 1975(01)

4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 1979(01)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武官村北一座殷墓 1979(03)

4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 1981(04)

4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三家庄东发掘 1983(02)

4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 1986(08)

5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郭家庄的一座殷墓 1986(08)

5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薛家庄东南殷墓发掘简报 1986(12)

5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殷墟259、260号墓发掘报告 1987(01)

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4年秋安阳苗圃北地发掘简报 1989(02)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 1989(07)

5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7年安阳梅园庄南地殷墓的发掘 1991(02)

5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安阳郭家庄160号墓 1991(05)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0年河南安阳大司空村M539发掘简报 1992(06)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91年安阳后冈殷墓的发掘 1993(10)

5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1984-1988年安阳大司空村北地殷代墓葬发掘报告 1994(04)

60. 安阳市博物馆 殷墟戚家庄269号墓发掘简报 1986(03)

61. 安阳市博物馆 安阳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1986(03)

62. 安阳市博物馆 安阳市梯家口村殷墓的发掘 1992(01)

63.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安阳市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1995(01)

6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安阳郭家庄村北发现一座殷墓 1991(10)